

## 另類視角的宋金鼎革—— 山西金墓所見的戰後社會與技藝人才 流動

許雅惠\*

靖康戰後華北成為金國領土，大量人口被迫遷徙。面對此家國鉅變，文人士大夫留下文字，記錄戰時流離，而傳統文獻中幾近無聲的庶民階層，是如何面對政權轉換？本文分析考古出土的金代山西磚雕壁畫墓，從當中的墨書題記與墓誌一窺地方經濟菁英在戰時的處境與因應。入金之後，山西墓葬出現大量可識讀的墨書詩文，從內容與書寫特徵可知，應有通曉文字之人投入造墓行業。在考察宋金之際山西墓葬的變化後，本文論證此現象應與開封陷落後，大量高級技藝人才徙入河東有關，金代山西於是承接了北宋河南的文化繼續發展。考古出土墓葬提供有別於知識菁英的另類視角，其所具有的直接性與臨場感，讓我們對靖康之難及其後續能有最一手的觀察。

關鍵詞：墨書題記、金代華北、墓葬文化、通俗詩歌曲文、人群移動

---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 一、前言：宋金變革

戰後移居南方的李清照(1084-1155)，在翻閱亡夫趙明誠(1081-1129)撰寫的《金石錄》時，寫下戰時傷別離的一頁。李清照原來與趙明誠居住於山東青州，宋金戰爭時，甫失去丈夫的她帶著財物與收藏，隨著高宗朝廷一路往南逃難，先後經台州、溫州、越州等地，最後落腳杭州，財物也在途中一一丟失捨棄。<sup>1</sup>李清照的逃難經歷可說是許多華北士大夫家族的共同寫照，他們一路跟隨朝廷遷徙，在局勢稍歇後，暫厝於行在杭州。由於南來的士大夫家族人數過多，地狹的杭州難以負荷，宋高宗(1127-1162在位)還特許他們占寺院居住。<sup>2</sup>不少人在情勢穩定之後，繼續遷居至南方各地。<sup>3</sup>

不少北方的士大夫家族跟隨朝廷避難至杭州，至於陝西藍田的呂大防(1027-1097)家族則是另一種模式。也許是因為徽宗崇寧年間(1102-1106)的元祐黨禁牽連，元祐宰相呂大防的家族子弟們官位不顯，長居於關中或鄰近地區。戰爭爆發後，他們就近從關中移居至蜀地。<sup>4</sup>2006

<sup>1</sup> 李清照，〈金石錄後序〉，收入趙明誠著，金文明校證，《金石錄校證》（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頁531-540。

<sup>2</sup> 周密撰，吳企明點校，《癸辛雜識》（北京：中華書局，1988），後集，〈許占寺院〉，頁73。

<sup>3</sup> 吳松弟，《北方移民與南宋社會變遷》（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

<sup>4</sup> 「（紹興元年六月）乙亥……朝奉大夫呂景山主管台州崇道觀。景山，大防子，建炎初提舉潼川府路常平官，省而罷，寓家於蜀，至是因其請而命之。」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北京：中華書局，1988），卷45，頁811。「（紹興七年五月）右朝散大夫呂錫山依舊知果州（今四川南充）。錫山，大忠子也，寓居於蜀上，召之，錫山辭不至。」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111，頁1800。其中《建炎以來繫年要錄》高宗紹興元年呂景山這條資料有誤。根據陝西藍田呂氏墓地M4出土的器物刻銘，可知墓主為呂景山，已於徽宗政和十一年(1111)下葬。原文中的呂景山應為呂省山

年，呂大防家族在陝西藍田的墓地被發現，一共有 29 座墓葬，出土大量文物與墓誌銘。<sup>5</sup>呂氏族人入川，大概也將考古、好古之風帶到四川，四川南宋窖藏出土大量仿古青銅器，有些器物的造型、紋飾或銘文明顯來自《考古圖》，或許與呂氏家族在宋金戰後移居四川有關。<sup>6</sup>

士大夫家族留下文字敘述逃難過程的艱辛，至於戰爭對一般民眾有何影響？他們如何面對朝代更迭？史書中留下一些簡短記錄，描述士庶扶老攜幼奔走流離。<sup>7</sup>這種情況大概發生在戰爭的重災區，如北宋首都汴京的人口在繁盛時超過百萬，金人掠奪離去之後「所謂京師者，數千里瓦礫場中巍然一空城而已。」<sup>8</sup>首都之外，《宋史》也記載河東地區：「威勝、隆德、汾、晉、澤、絳民皆渡河南奔，州縣皆空。」<sup>9</sup>不只河南，河東地區的民眾也都棄家逃亡去了。

這幅蕭條空疏的景象卻和考古出土的山西宋金墓葬所見不甚相符。墓葬根植於人們的死後觀念，是信仰的具體展現；墓葬也是一幅社會的縮影，墓室構造與隨葬品反映出墓主的社會身份與財富。就地

之誤，呂省山於紹興元年尚存於世。呂景山墓葬見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編，《藍田呂氏家族墓園》（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頁 340-345。

<sup>5</sup> 考古報告四大冊已正式出版，見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編，《藍田呂氏家族墓園》。

<sup>6</sup> Ya-hwei Hsu, "Reshaping Chinese Material Culture: The Revival of Antiquity in the Era of Print," Ph.D. diss., (Yale University, 2010), 216-233.

<sup>7</sup> 吳松弟，《北方移民與南宋社會變遷》，頁 12-23。

<sup>8</sup> 趙鼎，《辯誣筆錄》（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函海本），卷 1，頁 5b-6a。開封城破之後的慘況，包括金兵掠奪與瘟疫肆虐，見梁偉基，〈圍城告急——金兵鐵蹄下的開封〉，《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53（香港，2011），頁 57-86。

<sup>9</sup> 脫脫等，《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元至正本配補明成化本），卷 23，頁 430。「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擷取日期：2019 年 8 月 6 日。

理分佈而言，山西是金代墓葬出土數量最多的省份，多半以磚砌造，形狀為八角形、方形或圓形，墓頂作穹窿形以象徵天穹，牆壁則模仿木構建築砌出樑柱與斗拱，有時還有細緻的磚雕門扇。牆上經常施以彩繪，十分華麗，題材除了富有裝飾性的吉祥花卉之外，還包括孝子圖、墓主夫婦像與各種世俗生活場景，以雜劇磚雕最富特色，偶爾也可見喪葬場面之描繪。<sup>10</sup>隨葬品通常很少，只有幾件陶瓷器，原來或許有紙紮人偶等明器，日久腐朽了。<sup>11</sup>這些墓葬罕見墓誌銘，少數有地券，最常見的是在墓室牆壁上書寫文字，內容包括墓主家族署名的葬記與工匠的砌墓記錄等。迪艾德·庫恩(Dieter Kuhn)曾大規模分析過宋代墓葬，按墓葬結構與隨葬特徵歸納可能的使用者。<sup>12</sup>前述山西宋金墓葬之特點顯示，它們應該是屬於地方的經濟菁英，包括地主與商人。

比較山西地區宋、金兩時期的墓葬，金墓不僅在數量上遠超過宋墓，內部裝飾也比宋墓更加繁複而華麗，似乎顯示此地很快便從戰爭的打擊中恢復，而且地方經濟發展可能還超過北宋。由此不得不令人重新思考《宋史》對河東各州的記載：「渡河南奔，州縣皆空」，這段文字應如何理解？傳統文獻由士人階層所撰寫，研究者只能透過士人的眼光來觀看社會中的廣大民眾。考古墓葬材料可突破這重限制，

<sup>10</sup> 關於宋金墓中雜劇圖像在喪葬中的功能，見 Jeehee Hong, *Theater of the Dead: A Social Turn in Chinese Funerary Art, 1000-140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6).

<sup>11</sup> 南宋趙彥衛《雲麓漫鈔》(序於1206年)載：「古之明器，神明之也。今之以紙為之，謂之冥器，錢曰冥財。冥之為言，本於漢武紀『用冥羊馬』，不若用『明』字為近古云。」見趙彥衛撰，傅根清點校，《雲麓漫鈔》(北京：中華書局，1996)，卷5，頁83。

<sup>12</sup> Dieter Kuhn ed., *Burial in Song China* (Heidelberg: Edition Forum, 1994); Dieter Kuhn, *A Place for the Dead: An Archaeological Documentary on Graves and Tombs of the Song Dynasty (960-1279)* (Heidelberg: Edition Forum, 1996).



直視死後世界中的各個社會階層，及其物質、視覺與文字遺存。

本文以考古出土的山西金代墓葬作為主要材料，集中分析這群地主豪右墓中出土的文字資料，主要是墓壁上的墨書題記與詩文。這些長篇的墨書文字，罕見於北宋，是山西入金後的新發展。本文第一部分討論十二世紀上半葉地下墓葬中的題記，試圖了解在文獻中幾近無聲的一群人，如何在宋金鼎革的政治新局勢中尋求機會與發展。接著將焦點集中於十二世紀中葉以後的墓葬，討論墓中出現的高品質長篇墨書詩歌與曲文，分析其內容與書寫特徵，及其所透露之社會變化。最後回到宋金戰爭的歷史背景下，對山西墓葬由宋入金的改變提出可能的解釋。

## 二、戰時的處境與因應

戰爭對一般平民百姓帶來哪些影響？山西長治屯留宋村的宋榮墓提供了文字線索。該墓沒有出土墓誌與地券，但墓室四壁有長篇的墨書題記，年代為金太宗天會十三年(1135)，宋高宗紹興五年。<sup>13</sup>題記內容除了買地、鎮墓等墓中常見文字，還記載了對當地產生重大影響的政治、社會事件，包括靖康之變、女真屯兵、紅巾盜賊等。

書寫於墓室東壁的兩段如下(圖 1)：

段 1：乙卯歲，潞州屯兵十萬，差配甚多，楊上監坐知州，人名[民]難過，大旱二年，米一千、麥八百、粟五百。本村著鐺鍋三十一个，赴本州納。

段 2：乙卯歲，當幡人駟上皇、少帝於嶺北[嶺北]，外有康王走在江南，幡家到江南迴兵当年，正月廿四大金皇帝萌[崩]也。

<sup>13</sup> 王進先、楊林中，〈山西屯留宋村金代壁畫墓〉，《文物》，2003：3(北京，2003)，頁 43-51。

段1的大意是說，天會十三年，歲次乙卯，女真於潞州(今山西長治)屯重兵十萬，此時的知州是楊上監。為供應軍隊所需，當地人民的差配甚多，除了繳納米、麥、粟等軍糧外，還要上繳烹飪用的鑊鍋，不幸又連二年碰上旱災，人民日子難過。段2則是記載靖康之後的大事，同樣在天會十三年，女真人已將上皇徽宗(1100-1126 在位)、少帝欽宗(1126-1127 在位)驅至嶺北，康王(即後來的高宗)則逃至江南。接著又記道，這年女真出兵江南，大金皇帝於正月二十四日駕崩。題記中稱女真人為幡人、幡家，有研究者認為「幡」即文獻中的「番」或「蕃」。<sup>14</sup>整體說來，東壁這兩段文字與墓葬沒有關係，從「差配甚多」、「人名[民]難過」等字句看來，似乎在表達對女真屯兵擾民的不滿。

至於書寫於墓室西壁的題記，讀起來像是砌墓匠人李通的自述(圖2)：

段3：砌造匠人李通，家住沁州，銅提縣底水村人是[氏]，內為紅巾盜賊驚移到此，砌到葬一所，係大金國女直軍國領兵收卻趙皇家。

李通原來住在北邊的沁州(今山西沁縣)，因為紅巾盜賊騷擾而移居潞州，在此為人砌墓，末句再次提到大金國女真軍隊打敗趙宋皇家一事。「紅巾盜賊」是宋、金戰爭時出現的抗金團體，活躍於河東地區，以紅巾為標幟。<sup>15</sup>從這段題記可知，游擊抗金的紅巾，破壞地方治安，有些人因此而逃離家鄉。潞州由於有女真重兵屯駐，大概是當時比較安定的地方，成為河東逃難民眾的避風港。

<sup>14</sup> 題記文字的釋讀與內容考證，見王義印，〈山西屯留宋村金代壁畫墓墨書題記研究〉，《中原文物》，2014：6(鄭州：2014)，頁113-118；李浩楠，〈山西屯留宋村金代壁畫墓題記考釋〉，《北方文物》，2010：3(哈爾濱，2010)，頁76-78。

<sup>15</sup> 黃寬重，《南宋時代抗金的義軍》(臺北：聯經出版，1988)，頁31-63。

東、西壁題記對女真的稱呼不同，有幡人、幡家、大金，顯示在這個宋、金之間衝突不斷的時期，河東雖已為金人控制近十年，但局勢仍未完全明朗，當地民眾對女真的統治也是正、反兩面情緒夾雜。女真的重兵駐紮帶來沉重差配，加上旱災使得生活困難，加深人們對趙宋王朝的懷念與期待。不過，女真的軍隊屯駐也為地方帶來安定，使得潞州成為逃難者的避風港，免受抗金盜賊侵擾。

且讓我們回到宋金戰爭的歷史脈絡中理解這幾段文字。天會三年(1125，宣和七年)，金滅遼，接著兵分二路，入侵宋國。東路之軍由幹離不主之，自燕山侵河北；西路之軍由粘罕率領，自雲中進攻河東，兩軍最終會師汴京。<sup>16</sup>長治盆地位處晉東南，當時屬潞州，位於粘罕率領的西路軍線上，接下來對此戰線的情況稍作梳理。

粘罕自晉北南下，進兵取朔、武、代、忻四州，過石嶺關，圍太原。根據記載，金軍一路沒有遭遇太大抵抗，原因之一是宋朝招募不少勇悍的燕雲漢兒入內地為漢軍，但他們與宋朝官軍長期不睦。當粘罕入侵時，有些漢兒成為內應，開城門以迎金人。粘罕一路如入無人之境，直趨太原。<sup>17</sup>粘罕一方面派兵圍太原，一方面分兵南進，天會四年(1126，靖康元年)九月破太原，奉祀宋太宗御容的原廟不保。<sup>18</sup>太原

<sup>16</sup> 關於宋金戰事的梳理，見李天鳴，〈靖康元年夏秋之太原之役〉，《故宮學術季刊》，22：1(臺北，2004)，頁145-182；〈靖康之難——宋金第二次汴京之役〉，《故宮學術季刊》，24：4(臺北，2007)，頁25-70。關於兩宋之際，宋金兩國之間的戰和與使節交聘，見陶晉生，《宋代外交史》(新北：聯經出版，2020)，頁208-358。

<sup>17</sup>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23，頁171a-172a。「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236^1552465702^803^^60207001000600230010^P@@@1542344061#top>，擷取日期：2020年11月23日。

<sup>18</sup> 徐夢莘撰，《三朝北盟會編》，卷53，頁400b。「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236^1552465702^809^^020700>

圍城凡二百六十日，城中軍民餓死者十之八九。<sup>19</sup>克太原後，粘罕決定南下攻汴京，於是出兵汾、晉之間，克平陽府，據載澤、潞官兵多棄城走，粘罕乘勝克河陽府與西京洛陽。<sup>20</sup>接下來又克鄭州、懷州，十一月二十五日進圍汴京，一個月後城破。<sup>21</sup>在戰事頻仍的二年之間，原來號稱百萬以上人口的汴京，不少居民大概都遷徙至外地避難了。

河東地區的守將不戰而降，潰逃的士兵則與地方豪強組成反抗勢力，盤踞太行山一帶，以游擊的方式打擊金兵，其中一支便是紅巾。<sup>22</sup>這些抗金的地方武力有時接受宋將號令，約定共同起兵，不過紹興十一年底(1142)宋、金達成和議，兩國劃定邊界，抗金勢力便逐漸消沉。

女真人一路勢如破竹，在攻陷汴京之後，倖存未被俘虜的康王趙構於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並一路南逃。當戰場轉移到江南後，金軍開始出現劣勢。天會十二年(1134，紹興四年)秋金國聯合它在華北扶植的劉齊政權，向江南發兵。然而戰事連番失利，金軍受阻，冬天金

---

1000668^@@1047363870#top, 擷取日期：2019 年 11 月 10 日。北宋在各地設有奉祀皇帝御容的宮殿，在太原者名曰「統平」，見李攸，《宋朝事實》(收入《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清乾隆敕刻武英殿聚珍本)，卷 6，頁 15a。「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236^1552465702^809^^0527043000105^@@556333714#top>, 擷取日期：2020 年 8 月 28 日。

19 徐夢莘撰，《三朝北盟會編》，卷 53，頁 398a。「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236^1552465702^803^^60207001000700280006^N@@1805210194#top>, 擷取日期：2020 年 11 月 23 日。

20 徐夢莘撰，《三朝北盟會編》，卷 64，頁 481b-482a。「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236^1552465702^802^^60207001000700390012@@1336962841#top>, 擷取日期：2020 年 11 月 23 日。

21 李天鳴，〈靖康之難〉，頁 25-70。

22 黃寬重，《南宋時代抗金的義軍》，頁 31-63。

太宗完顏晟(1075-1135)悴逝。<sup>23</sup>

天會十三年宋榮墓的墨書明確記載了金國皇帝駕崩，女真出兵江南而又回軍之大事，金軍失利的消息想必已經傳回晉南。此時女真佔領潞州還不到十年，宋、金之間大小戰事不斷，不過宋軍已經開始扳回劣勢，又有紅巾等抗金勢力在華北作為內應。面對此混沌的情勢，晉南人民似乎充滿了矛盾，題記的語氣有時以宋國子民自居，稱徽宗「上皇」、高宗「少帝」，有時又顯得有些疏離，如「係大金国女直軍国領兵收卻趙皇家」。對新來乍到的女真政權，有時稱為大金、有時稱為幡；對重兵屯駐帶來的沉重差配有所不滿，但軍隊又為地方帶來安定。這種兩面的矛盾情緒，應是許多鼎革之際的小人物們共同的心情寫照，從中可見晉南人民對當下與未來充滿了不確定感。

李榮墓的題記對於新政權似乎尚有懷疑，還不能確定是否就此改朝換代。八年之後，這樣的不確定感消失了，金人統治成為定局。由皇統三年(1143)崔晟(1064-1126)與妻子張氏(1060-1143)墓誌可知，宋金鼎革，有些家族並未因戰爭而受難，而是在變局中趁勢興起，並且隨著金人統治趨於穩定，家族產業也愈發興旺。崔晟夫婦墓位於長治安昌村，石條砌築且帶多個耳室，有相當規模，內間長、寬各 2.3 公尺，高 3.2 公尺。<sup>24</sup>墓中立一碑形石墓誌，碑額篆書「故崔君墓誌銘」，內容節錄如下(圖 3)：

君諱晟，曾祖諱文舉……皆務業農桑……祈居勤務，祖業越倍增進，春秋六十三，巨宋靖康改元三月十一日奄世，即始大金

<sup>23</sup>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 165，頁 1193b-1194a。「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236^1552465702^802^^60207001000800650011@@1674304506#top>，擷取日期：2020 年 11 月 23 日。

<sup>24</sup> 商彤流、楊林中、李永杰，〈長治市北郊安昌村出土金代墓葬〉，《文物世界》，2003：1(太原，2003)，頁 3-7。

軍擬往汴，抵澤回日也。其張氏警教二子，以繼君之志行。由是督思務耕桑，令友長鄉戶，始基百畝之餘，緣計僅乎十倍。即此又張氏起家之節操也。……君之美行，欽服久矣。其子思、友以狀求銘，驗其實而誌之，銘曰：……。<sup>25</sup>(底線為筆者所加)

墓誌銘的內容簡單，字體草率，也沒有撰者、書者姓名，與士人階層的墓誌截然不同。碑額雖題為「故崔君墓誌銘」，內容其實記錄了夫婦二人事蹟，妻子張氏的篇幅還更多一些。從墓誌可知，崔晟以農桑為業，靖康元年過世之後，在張氏的經營下，家產日增，由此可見張氏起家之能力。一般宋代的女性墓誌，特別是士人家族婦女，多半稱頌她們在家內的角色，<sup>26</sup>此方墓誌處幾乎沒有提到張氏的婦德，而是盛讚她操持家業有方。這除了反映士、庶階層的差異，也與張氏面臨的世變時局有關。

崔晟過世之時正當靖康改元春天，墓誌記載當時晉南已為女真所控制，金軍繼續揮兵河南，打算進取汴京，但到達澤州便返回。此處所載應該是第一次汴京之役，粘罕的西路軍包圍太原後，出師準備進攻河南，途中得知宋、金雙方已經議和，因此召回軍隊。<sup>27</sup>面對新統治者的到來，張氏「警教二子」，讓兩個兒子一個「務耕桑」，另一個「長鄉戶」，也就是自願擔任「鄉戶」衙前吏員，輔佐地方長官進行徵稅與送往迎來事宜。<sup>28</sup>女真人統治的十數年間，在二個兒子的努

<sup>25</sup> 商彤流，〈長治市安昌村出土的金代墓葬〉，《藝術史研究》，6(廣州，2004)，頁418。

<sup>26</sup> 士大夫階層的女性墓誌書寫特點，見劉靜貞，〈女無外事？——墓誌碑銘中所見之北宋士大夫社會秩序理念〉，《婦女與兩性學刊》，4(臺北，1993)，頁21-46。

<sup>27</sup> 李天鳴，〈靖康元年夏秋之太原之役〉，頁145-182。

<sup>28</sup> 關於鄉戶的職權，見王曾瑜，〈宋衙前雜論(一、二)〉，《北京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6：3(北京，1986)，頁76-82；1987：1(北京，1987)，

力下，崔家產業倍增。

受限於文體，墓誌銘的內容簡略而含蓄，只說「張氏警教二子」。若結合文獻記載，回到當時的時局，可知墓誌沒有說的是：戰爭破壞既有的社會秩序，地方上的官員、守將與士兵紛紛逃亡，權力出現真空，有些地方家族趁機崛起並累積財富。在新的統治者到來後，張氏與二子大概成為他們的協力者，以此穩固家族在地方上的地位。

丈夫死後，張氏與兒子經歷宋、金易代的時局變化。西元 1126 年太原城破，河東落入金人之手；1138 年宋金達成第一次和議，金國將陝西、河南地歸還宋國，但不到一年，金人再次出兵，兩國又兵戎相見；1142 年，也就是張氏過世的前一年，宋、金第二次和議達成，劃定邊界，北歸北、南歸南，彼此互不相犯。自 1126 至 1142 年，十六年間，華北地區原屬趙宋的子民們，一開始對金人的統治也許還有懷疑，在宋金第二次和議之後，應已逐漸接受自己成為大金子民的現實。在此情況下，作為金人協力者的崔氏家族在地方上的勢力也趨於穩固，張氏的行為也得以蓋棺論定，為她博得具「起家之節操」的美名。

### 三、政權交替後的河東

十二世紀下半，華北易主已逾二十年，宋、金鼎革對當地社會產生的影響逐漸清晰。從考古出土的山西墓葬來看，最大的改變是墓中出現長篇墨書，文字被融入成為壁畫裝飾的一部分。

北宋時期華北墓葬也可見墨書，最講究的是山東萊州元豐七年(1084)墓，除了甬道上以墨書書寫墓誌，墓室北壁上層還抄錄了四首詩

歌，壁畫也帶有文字榜題。<sup>29</sup>不過這在北宋尚不流行，河南與山西墓葬的墨書文字均相當簡單，多半是喪家的葬記、工匠的砌墓題記、與圖像榜題。如河南白沙元符二年(1099)趙大翁墓壁畫上的糧袋寫著「元符二年趙大翁布□」，提示修墓時間與墓主姓名。<sup>30</sup>

圖像榜題以孝子故事最具代表。營建墓室以安葬雙親本身便是孝行的展現，又在墓中圖繪孝子故事，更加凸顯孝的重要。<sup>31</sup>孝子題材在河南、山西一帶北宋平民墓葬中非常流行，出土例證相當多，製作方式有墓壁彩繪與立體磚雕兩大類，圖像依循程式化的格套表現，經常有簡單的榜題標誌畫像主題。<sup>32</sup>紀年例證如山西長治壺關下好牢村北宋宣和五年(1123)王氏墓，四壁嵌有高浮雕磚雕孝子故事十七幅，均帶有墨書「曹娥」、「閔子騫」、「王祥」等榜題。<sup>33</sup>

入金後，除了喪家葬記、砌墓題記、與圖像榜題，山西墓葬出現

<sup>29</sup> 煙臺市博物館，〈山東萊州南五里村宋代壁畫墓發掘簡報〉，《文物》，2016：2(北京，2016)，頁4-20。

<sup>30</sup> 宿白，《白沙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57)，圖版31。

<sup>31</sup> 關於宋代喪葬與孝道精神的展現，參 Christian De Pee, "Conclusion: Texts and Tombs, Ritual and History," in *The Writing of Weddings in Middle-Period China: Text and Ritual Practice in the Eighth through Fourteenth Centuri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7), 221-249; Cong Ellen Zhang, "Chapter 3: When and Where? Burial and Filial Piety," in *Performing Filial Piety in Northern Song China: Family, State, and Native Plac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20), 83-117. 前者涉及幾座代表墓葬，後者則以文獻為討論對象。

<sup>32</sup> 關於孝子故事圖的製作與格式化設計，見 Fei Deng, "Modular Design of Tombs in Song and Jin North China," in *Visual and Material Cultures in Middle Period China*, edited by Patricia Ebrey and Susan Huang (Leiden: Brill, 2017), 41-81.

<sup>33</sup> 王進先，〈山西壺關下好牢宋墓〉，《文物》，2002：5(北京：2002)，頁42-55。



篇幅相當長的墨書詩文。有伴隨孝子故事圖像的孝子傳，也有通俗的詩歌曲辭。這些文字直接題寫在墓室壁面上，有類文人墨客在建築或壁面上信筆揮毫留下的題壁詩。這些墨書詩文的內容與書寫特徵均顯示，書寫者的文字能力較以往提高不少，以下就墨書詩文的內容進行分類討論。

### (一) 二十四孝子傳

延續北宋後期發展，華北金墓流行以孝子故事作為裝飾，畫像旁也經常帶有簡單榜題，如山西運城聞喜縣小羅莊金正隆年間(1156-1161)墓葬，圖像旁有「孟宗哭竹生筍」、「王祥臥冰求魚」、「曹娥沿江哭父」等題記。<sup>34</sup>其中山西長治魏村金天德三年(1151)墓的孝子故事最特殊，伴隨孝子圖像的是長篇孝子故事，圖、文左右對應，環繞四壁上層，成為分隔人間與天界的中間地帶，下方是世俗生活場景，上方是象徵天穹的墓頂(圖 4)。<sup>35</sup>整個孝子畫像始自南壁，由標題：「畫相二十四孝銘」揭開序幕；終於北壁，以題記「天德三年十月二十五日畫了畢」作結。南壁元覺圖旁寫著：「孝感於神明，光於四海，無私[所]不服」，這段文字源自《孝經》：「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sup>36</sup>說明以孝子故事裝飾墓葬，除了勸人行孝，也

34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聞喜縣博物館、楊富斗，〈山西省聞喜縣金代磚雕、壁畫墓〉，《文物》，1986：12(北京：1986)，頁 36-46。

35 長治市博物館，〈山西長治市魏村金代紀年彩繪磚雕墓〉，《考古》，2009：1(北京，2009)，頁 59-64。

36 〈古文孝經宋本〉，收入孔安國，《古文孝經孔氏傳》(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知不足齋叢書據清乾隆鮑廷博校刊本)，頁 5a。「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250^1871790305^809^^0529002000021^@@1646439635#top>，擷取日期：2020 年 1

與孝能感動天的傳統思想有關。有學者因此以為孝子圖像具有感通功能，可幫助墓主靈魂上升至仙界。<sup>37</sup>

長治魏村孝子圖題名「畫相二十四孝銘」，每則孝子「畫相」旁應該有一段「銘」，可能是四字一句的韻文，不過壁面上僅有孝子小傳，省略「銘」。孝子畫像與文字彼此交替，形成右圖左文或左圖右文的形式，有如書畫手卷或印版書一般。以鮑山故事為例，首行為「鮑山」標題，接著是一段文字敘述鮑山行孝故事：「□木也至孝，漢末大□□□母往南秦避難，涉山險，以荊籠盛之，背負往秦，逢賊為孝遺□數處□□山奉其母。出《西漢書》」(圖5)。文末雖提到《西漢書》，但現存的《漢書》並無此故事，不知所據為何。

畫像與文字總數各二十四，與「畫相二十四孝銘」題名相符，不過圖像與文字兩者有些無法對應。表1按分佈位置，編號整理各則畫像之圖、文內容，並將南、北與東、西壁的畫像主題並置，以呈現出壁面之間的對應：

表1 山西長治故漳魏村金天德三年(1151)墓磚雕孝子故事圖、文配置

| 編號 | 圖     | 文   | 編號 | 圖     | 文    |
|----|-------|-----|----|-------|------|
| 南1 | 趙孝宗   | 趙孝宗 | 北6 | 丁蘭    | 丁蘭   |
| 南2 | 丁蘭(重) | 無   | 北5 | 田真(重) | 無    |
| 南3 | 田真    | 田真  | 北4 | 王祥    | 王祥   |
| 南4 | 鮑山    | 鮑山  | 北3 | 王武子妻  | 王武子妻 |

2月4日。

<sup>37</sup> 鄧菲，〈關於宋金墓葬中孝行圖的思考〉，《中原文物》，2009：4(鄭州，2009)，頁75-81。

|    |    |    |  |    |     |     |
|----|----|----|--|----|-----|-----|
| 南5 | 鄒子 | 鄒子 |  | 北2 | 郭巨  | 郭巨  |
| 南6 | 元覺 | 元覺 |  | 北1 | 閔子騫 | 閔子騫 |

| 編號 | 圖      | 文   |  | 編號 | 圖     | 文                |
|----|--------|-----|--|----|-------|------------------|
| 東1 | 韓伯瑜    | 韓伯瑜 |  | 西7 | 無     | 董永 <sup>38</sup> |
| 東2 | 陸績     | 陸績  |  | 西6 | 舜子    | 舜子               |
| 東3 | 無      | 劉殷  |  | 西5 | 鮑山(重) | 姜師               |
| 東4 | 曹娥     | 曹娥  |  | 西4 | 曾參    | 曾參               |
| 東5 | 劉明達    | 劉明達 |  | 西3 | 魯義姑   | 魯義姑              |
| 東6 | 孟宗     | 孟宗  |  | 西2 | 萊順    | 萊順               |
| 東7 | 老萊子(重) | 楊香  |  | 西1 | 老萊子   | 老萊子              |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墨書文字為完整的二十四則孝子小傳，至於畫像總數雖也是二十四，但只描繪了二十個故事，有四幅重複出現，在表 1 中以「(重)」標示，包括：丁蘭、田真、老萊子、鮑山。此外，僅有文字而缺乏對應圖像的有：劉殷、楊香、姜師、董永。圖文不符者共六處，如表 1 粗體所示：南、北兩壁的丁蘭與田真有圖無文；東、西兩壁的劉殷與董永有文無圖；東 7、西 5 則是文字與畫像內容不符。

墨書二十四則故事俱全，而畫像有重複、有缺圖、有圖文不符。這不是孤例，山西沁縣另一座金墓的二十四孝磚雕的圖、文也有出入，如：曹娥圖旁的墨書寫著「孟宗為母思竹笋」。<sup>39</sup>由此推測，墨書文

<sup>38</sup> 無磚雕圖像，考古報告未列此段題記，根據圖版 16.3 增補，見長治市博物館，〈山西長治市魏村金代紀年彩繪磚雕墓〉，《考古》，2009：1(北京，2009)，圖版 16.3。

<sup>39</sup> 見商彤流、郭海林，〈山西沁縣發現金代磚雕墓〉，《文物》，2000：6(北

字與磚雕畫像兩項工作可能是由不同的人員施作，各行其是，因而產生圖、文無法對應的情況。墨書文字與磚雕畫像兩項工作實際如何執行？以下稍做復原。

所謂的磚雕實際上是一塊塊的畫像磚，作法是將磚泥放到預先製好的畫像模中壓印而成，乾燥後入窯燒結，再於表面施加彩繪。由於是一方方獨立的畫像磚，一塊磚雕就是一個模組子件(module unit)，使用時可依需求挑選合用的主題故事，在砌墓時嵌入墓室牆壁，相當靈活有彈性。<sup>40</sup>比起畫工提筆在壁面上彩繪圖像，使用印模重複印製的畫像磚，生產更有效率。磚上的圖案雖非獨一無二，不過可以利用彩繪增加多樣性，如長治魏村金墓中，丁蘭畫像同時出現在南、北壁，但前景人物的服裝顏色不同，以避免重複單調之感(圖 6)。

畫像磚須在作坊預先燒成，再到墓室組裝；墓壁上的墨書文字則是在處理好的壁面上直接寫就，書寫者本人必須親臨現場，且每次提筆書寫均是獨一無二，無法複製。墓壁墨書雖然無法與名家書法相比，但兩者在書寫的本質上是一樣的。這些墨書的提筆者必定通曉文墨，至於書法品質優劣、文字能力高低，這是另外的問題。有些書寫者水平一般，字跡樸拙，有時潦草，經常出現俗字、錯字，如前一節討論的宋榮墓墨書與崔晟夫婦墓誌。而長治魏村金墓的二十四孝圖銘文書寫者則不然，他能夠抄寫長篇文字，少見錯字、俗字，書跡自然流暢，文字能力較大多數墓葬為高，應是能書能文者。

---

京，2000)，頁 60-73。

<sup>40</sup> 模組化是中國古代工藝、建築的一大特點，相關分析見 Lothar Ledderose, *Ten Thousand Things: Module and Mass Production in Chinese Ar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關於宋金墓葬的模組化特點，見鄧菲，〈試析宋金時期磚雕壁畫墓的營建工藝——從洛陽關林廟宋墓談起〉，《考古與文物》，2015：1(鄭州，2015)，頁 71-80、123；鄧菲，《中原北方地區宋金墓葬藝術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9)，頁 70-77。

長治魏村的二十四孝墨書孝子故事是目前所見最長、最完整的，相同的孝子傳文字也見於金正隆三年(1158)長治長子縣石哲公社出土的二十四孝壁畫，只是文字較簡短，只節錄部分內容。<sup>41</sup>二墓出現相同的文字，說明書寫者有共同的文本來源。與長治金墓相同的二十四孝組合還廣泛見於北宋至金代河南與山西地區地方菁英墓中，應該有一套孝子故事文本流行於宋金華北民間。

孝子故事自漢代出現之後，在社會中廣泛流行，各時期的孝子數量與組合也不盡相同。目前所知最早的二十四孝故事出自敦煌的五代抄本《故圓鑒大師二十四孝押座文》，是變文前方的序文。<sup>42</sup>而今日流傳於中國的二十四孝故事成立於元、明時期，主要有三個系統，各本選錄的孝子故事與敦煌五代抄本均有出入，不是同一系統。<sup>43</sup>至於宋金華北墓中的二十四孝組合，則與前述諸本皆不相同，而與十四世紀高麗晚期編成的《孝行錄》(李齊賢[1287-1367]序)相同。<sup>44</sup>由此可知，宋金華北墓葬所根據的民間本子，後來在中國失傳了，這個本子至遲在元代東傳至高麗，並且保留至今。

宋金華北民間流行的《孝行錄》，原來可能便是圖、文並列的「全

4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晉東南工作站，〈山西長子縣石哲金代壁畫墓〉，《文物》，1985：6(北京，1985)，頁45-54。

42 魏文斌等，〈甘肅宋金墓「二十四孝」圖與敦煌遺書《孝子傳》〉，《敦煌研究》，1998：3(蘭州，1998)，頁75-90。

43 金文京，〈略論《二十四孝》演變及其對東亞之影響〉，《中國文化研究》，2019：2(北京，2019)，頁42-60。

44 關於高麗《孝行錄》與宋金墓壁畫二十四孝的對應，見金文京，〈『孝行錄』と「二十四孝」再論〉，《藝文研究》，65(東京，1994)，頁269-287。關於宋遼金墓二十四孝圖像的墓葬整理，見黑田彰，《孝子伝の研究》(京都：思文閣出版，2001)，頁252-305；董新林，〈北宋金元墓葬壁飾所見「二十四孝」故事與高麗《孝行錄》〉，《華夏考古》，2009：2(鄭州，2009)，頁141-152。

相」形式。這類「全相」書籍尚有不少元、明刊本流傳於世，不過南宋與金代刊本則屈指可數，可從宋刻遞修本孔府後人孔傳的《東家雜記》（自序於1134）、金代孔元措《孔氏祖庭廣記》、宋元福建建安書坊刊刻的全相通俗故事，推想其樣貌（圖7）。<sup>45</sup>魏村金墓「畫相二十四孝銘」圖、文並列的形式，可能是借自當時流行的帶插圖通俗讀物。

長治魏村的銘文書寫者能在墓壁上抄錄長篇的孝行故事，可能是讀書之人，至少有能力閱讀通俗讀本。從書法來看，雖比不上名家之作，但書跡清晰可辨，筆畫穩定且自然流暢，顯然也是通曉筆墨之人。關於這位書寫者，墓室北壁孝子故事後方有段的墨書題記，提供墓室營造的線索：「王二初砌藏人匠，崔博士，天德三年十月」，可知砌墓工匠名王二初，崔博士名字居後，字體稍大，位階較高，可能是墓室營造的總負責人，不知是否即為墨書的執筆者（圖6下）。另一座帶有長篇墨書孝子故事的金墓，即之前提到的長子石哲正隆三年（1158）墓，此墓以壁畫作為裝飾，同樣有一段工匠的造墓記錄：「正隆三年二月十六日了壁[畢]，畫匠崔瓊、程經」，可知壁畫由崔瓊、程經兩位畫匠所繪。<sup>46</sup>這個墓中的圖、文整合較佳，沒有錯置的情形，不知文字書寫者是否即為崔瓊、程經二人？

綜合以上討論，山西長治金墓孝子故事內容引自《孝行錄》一類的民間讀本，圖文左右並列的形式可能也參考了通俗的「全相」書籍，加上墨書的篇幅加長，書法自然，少見錯別字，推測這些書寫者的文字能力較過去提高許多。由於墨書的書寫者必須親臨現場提筆書寫，推測在宋金易代之後，可能有些通曉文墨之士投入墓室營建這個行業。

45 K. T. Wu, "Illustrations in Sung Printing,"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28:3 (July 1971): 173-195.

4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晉東南工作站，〈山西長子縣石哲金代壁畫墓〉，頁45-54。

## (二) 通俗詩歌曲文

十二世紀後半山西金墓的另一特點是將通俗詩句融入壁畫，有時寫在墓主夫婦身後的屏風，有時以書法掛軸或門楹對聯的形式出現。夫婦對坐圖像在北宋華北墓葬便相當常見，經常搭配樂舞場面，宿白稱為開芳宴。<sup>47</sup>墓主身後經常立有屏風，以凸顯主人翁的特殊地位，如河南白沙北宋元符二年趙大翁夫婦畫像後方便繪有大面屏風(圖 8)，上有書法裝飾，不過文字無法辨識，僅以曲線示意，應是畫工所作，類似情況也見於同時期河南地區墓葬。<sup>48</sup>進入金代，有些墓中的書法裝飾依舊以曲線示意，不過也出現一些書寫清晰、可以通讀的詩歌聯句。<sup>49</sup>

在墓壁上書寫詩歌曲辭的墓葬集中於山西中、南部，整理如附錄 1，紀年墓在前。詩句的選擇，有的配合墓葬情境，帶有塚、墳、陵、葬等字，如：「春雨□□名利塚，猛風吹破是非墳」、「漢陵無主自侵雲」。其中「筭來多葬北邙塵」，「北邙」一地自古以來是洛陽北郊著名的葬地，不少人士喜葬於此。有些詩句不限墓葬陰宅，人間居室似乎也合用，如：「有客來相問，如何是治生，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

分析墓中書寫的詩句曲辭，除了少數可能專為墓葬所作，如：「墓有重開之日，人無再少之顏」，多數採擷自既有作品。來源有古今詩

<sup>47</sup> 宿白，《白沙宋墓》，頁 48-49，註 53。

<sup>48</sup> 較特殊者有河南洛陽新安宣和八年(1126)墓，墓主背後也裝飾書法屏風，應該可以釋讀，不過圖像漫漶，難以辨識，見《中國墓室壁畫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墓室壁畫全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11)，頁 97，圖版 131。鄭州的壁畫墓無法辨識，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鄭州宋金壁畫墓》(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頁 96、139、145、146、151。

<sup>49</sup> 以曲線示意的金代壁畫書法屏風有聞喜縣博物館，〈山西聞喜寺底金墓〉，《文物》，1988：7(北京，1988)，頁 72，圖 13。

作，也有通俗雜劇戲曲；有時抄錄全詩，有時僅摘一句，更有擷取古今成為集句詩。以下分別說明。

### 1. 抄錄全詩

金代侯馬的張氏(1128-1182)卒後十九年於承安五年(1200)改葬，墓室四壁滿佈墨書文字，以文字作為墓壁裝飾，最為特殊。<sup>50</sup>當中西壁的七言律詩抄自蘇軾(1037-1101)詩，不過這首詩不見於蘇軾詩集，而是保留在河南洛陽所出土，元代鄭擇(1248-1325)墓誌背面的一幅線刻書畫作品(圖 9)。<sup>51</sup>石刻上半為蘇軾的七言律詩，標題作「齊國孟嘗君」，下半為李公麟的人馬繪畫，從題詩可知描繪的是孟嘗君擁馬醉歸的故事。詩句末尾刻有署款「元祐五年[1090]三月二日書」，並有「東坡居士」印章，末行為「李伯時畫」，時間、書者、畫者、畫題一應俱全。為何此幅作品會刻於墓誌石後方，原因不明，或許這是鄭擇家族的收藏，來自與蘇、李大約同時的祖先鄭居中(1059-1123)。<sup>52</sup>

表 2 比較張氏墓的詩句與蘇軾原作。張氏墓抄錄了全詩，不過竟然將詩題「齊國孟嘗君」誤以為是作者，而且個別文字也有訛誤，可見詩歌在通俗文化中的流傳與變衍。末句相當流行，還見於元代關漢卿雜劇曲文與朱晞顏七言絕句，作「笙歌引至畫堂前」。<sup>53</sup>

<sup>50</sup> 楊及耘、高青山，〈侯馬二水 M4 發現墨筆題寫的墓志和三篇諸宮調詞曲〉，《中華戲曲》，2003：2(臨汾，2003)，頁 1-5。

<sup>51</sup> 廖奔首先指出此七律為蘇軾之作，見廖奔，〈誤讀的諸宮調「重大發現」——侯馬二水金墓曲辭解〉，《戲曲研究》，2019：2(北京，2019)，頁 197-198。鄭擇墓誌見陳瑞農、趙振華，〈鄭擇墓志與李公麟《擁馬醉歸圖》〉，《東南文化》，1991：1(南京，1991)，頁 97-99。

<sup>52</sup> 陳瑞農、趙振華，〈鄭擇墓志與李公麟《擁馬醉歸圖》〉，頁 99。

<sup>53</sup> 吳曉鈴等編校，《關漢卿戲曲集》(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8)，頁 390，「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



表 2 侯馬張氏墓七言律詩與鄭擇墓誌背面蘇軾詩作比較

| 侯馬張氏墓西壁墨書  | 鄭擇墓誌背面石刻  |
|--|---|
| 陰雲忽散曉霜天，畫戟門開見墜仙，<br>錦襖綉衣宮□□，玉簪珠泪客三千。<br>閑騎白馬敲金鐙，□□茶樓動管弦，<br>幾度醉歸明月夜，笙歌引至華堂前。<br>孟常君作 <sup>54</sup> | 齊國孟嘗君<br>陰雲忽散曉霜天，畫戟門開見墜仙，<br>錦絡繡衣兵十萬，玉簪珠履客三千。<br>閑騎白馬敲金鐙，謾向青樓理管弦，<br>幾度醉歸明月夜，笙歌引入華堂前。 |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晉中榆次紀年 1228 年孟選墓東、西壁描繪了二幅書法掛軸，內容為唐人的五言絕句：<sup>55</sup>

詩 1：有客來相問，如何是治生，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

詩 2：江動月移石，溪虛雲傍花，鳥棲知故道，帆過宿誰家。

詩 1 為唐人所作，後二句「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見於唐代《王梵志詩》，之後屢被徵引，成為一句俗諺。<sup>56</sup>南宋羅大經在《鶴林玉露》

@236^1552465702^809^^^0406003000200^@@437978884#top, 擷取日期：2020 年 9 月 21 日。陶宗儀編，《說郛》（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上海涵芬樓排印本），卷 57，頁 2a。「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236^1552465702^22^^1@@1071853655#top>, 擷取日期：2020 年 9 月 21 日。

<sup>54</sup> 此七言律詩內容根據廖奔，〈誤讀的諸宮調「重大發現」〉，頁 185-206。

<sup>55</sup> 王俊、閻震，〈山西晉中發現金代正大五年墓〉，《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3：10（北京，2013），頁 6-8。

<sup>56</sup> 王梵志著，項楚校注，《王梵志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卷 6，頁 767。「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72^1210340289^809^^^0403004000323^@@1687608694#top>, 擷取

丙編(序於 1252)中便引此二句，稱之為俗語，作者已不可考。<sup>57</sup>元代吳師道(1283-1344)曾引全文四句，並以唐末五代的得道人士賀亢為作者。<sup>58</sup>此詩作者究竟是王梵志或賀亢，已難查考，可以確定的是，這首淺白易懂的詩歌，宋元之時成為流行的俗諺。詩 2 出自唐代杜甫(712-770)的〈絕句六首〉，文字全同。<sup>59</sup>除了出現在山西金墓之外，南宋洪邁(1123-1202)的《容齋隨筆》也曾完整收錄此詩，可見有一定流行。<sup>60</sup>

## 2. 摘錄聯句

紀年 1174 年長治長子小關村墓與 1212 年侯馬牛村 M31，二墓出現相同的文句：<sup>61</sup>

青山只會磨今古，綠水何曾洗□□

日期：2019 年 8 月 10 日。

<sup>57</sup> 原文為：「俗語云：『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指心而言也。三字雖不見於經傳，却亦甚雅」，見羅大經撰，王瑞來點校，《鶴林玉露》(北京：中華書局，1983)，丙編，卷 6，頁 335。「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72^1210340289^809^^^0301075000482^@@1484889845#top>，擷取日期 2019 年 8 月 10 日。

<sup>58</sup> 吳師道，《吳禮部詩話》(收入《知不足齋叢書》，清乾隆鮑廷博校刊本)，頁 10b。「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72^1210340289^809^^^0529146000012^@@1013665536#top>，擷取日期 2019 年 8 月 10 日。

<sup>59</sup> 杜甫，〈絕句六首〉，收入清聖祖康熙敕編，《全唐詩》，卷 228。「《全唐詩》分析系統」，<http://www.chinabooktrading.com/tang/>，擷取日期：2020 年 8 月 27 日。

<sup>60</sup> 洪邁撰，孔凡禮點校，《容齋隨筆》，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05)，五筆，卷 10，頁 944。

<sup>61</sup> 長治市博物館，〈山西長子縣小關村金代紀年壁畫墓〉，《文物》，2008：10(北京，2008)，頁 60-69；楊富斗，〈山西侯馬金墓發掘簡報〉，《考古》，1961：12(北京，1961)，頁 681-683。

青山只會□今□，淶水何曾□事□

雖然壁畫的文字不全、漫漶，但無疑是相同的文句。此句見於元代孔文卿《地藏王證東窗事犯雜劇》中「耍孩兒」曲文：

這靈隱寺嵯峨秀麗山疊翠，這瀑布嵐光水碧，這山千層萬壑似屏幃，這玉湖清皓蕩盡蘇堤。青山只會磨今古，綠水何曾洗是非！枉了你修福利，送的交人亡家破，瓦解星飛。<sup>62</sup>

《東窗事犯》講述秦檜夫婦於東窗下設計陷害岳飛之事，由此段曲文可復原金墓壁畫中完整的文句。「青山只會磨今古，綠水何曾洗是非」在晉南墓葬屢次出現，可知此句在金代便已十分流行，應該是通俗的民間唱詞，後來為元雜劇所繼承。

### 3. 集句詩

金墓墨書詩歌還有一類是集合古今詩作的集句詩。這種文體從北宋開始流行，為士大夫文人的遊戲之作，王安石(1021-1086)便以此聞名。<sup>63</sup>從山西金墓可知，集句詩聯在民間也相當盛行，長治壺關上好牢村 M1 的東、西壁有多首集句詩，不知何人所集，其內容與出處如表 3：<sup>64</sup>

<sup>62</sup> 寧希元校點，〈地藏王證東窗事犯雜劇〉，收入《元刊雜劇三十種》（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1988），第 2 折，頁 86。「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72^1210340289^809^^0402031000333^@@1002346740#top>，擷取日期：2019 年 8 月 10 日。

<sup>63</sup> 裴普賢，《集句詩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5），頁 39-52；《集句詩研究續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9），頁 2-25、244-274；張明華、李曉黎，《集句詩壇變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頁 122-134。

<sup>64</sup> 楊林中、王進先、暢紅霞、王偉、李永杰，〈山西壺關縣上好牢村宋金時期墓葬〉，《考古》，2012：4（北京，2012），頁 48-55。

表 3 山西長治壺關上好牢村 M1 集句詩

|    | 詩句內容                                 | 出處   |
|----|--------------------------------------|--|
| 東壁 | 松柏蕭蕭夾路青，人人到此盡傷情。<br>秦苑有花空笑日，漢陵無主自侵雲。 | 唐，陳上美，〈咸陽有懷〉： <sup>65</sup><br>山連河水碧氛氲，瑞氣東移擁聖君。<br><u>秦苑有花空笑日，漢陵無主自侵雲。</u><br>古槐堤上鶯千囀，遠渚沙中鷺一群。<br>賴與淵明同把菊，煙郊西望夕陽曛。   |
| 西壁 |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江城外柏森森。<br>君看青史勳榮者，算來多葬北邙塵。 | 唐，杜甫，〈蜀相〉： <sup>66</sup><br><u>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u><br>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鶯空好音。<br>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br>出何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br><br>宋，潘閬，〈樽前勉兄長〉： <sup>67</sup><br>一家久寄浙江濱，倏忽如今二十春。 |

<sup>65</sup> 陳上美，〈咸陽有懷〉，收入清聖祖康熙敕編，《全唐詩》，卷 542。「《全唐詩》分析系統」，<http://www.chinabooktrading.com/tang/>，擷取日期：2020 年 8 月 27 日。

<sup>66</sup> 杜甫，〈蜀相〉，收入李昉等奉勅編，彭叔夏辨證，勞格拾遺，《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66），卷 320，詩 170，頁 1656a。「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321^203995465^809^^0407015011713^@@1031594025#top>，擷取日期：2019 年 8 月 10 日。

<sup>67</sup> 潘閬，《逍遙集》（收入《知不足齋叢書》，清乾隆鮑廷博校刊本），頁 8a-8b。「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321^203995465^809^^0529093000042^@@599429234#top>，擷取日期：2019 年 8 月 10 日。

|  |  |   |
|--|--|---|
|  |  | 須信百年都似夢，莫嗟萬事不如人。<br>樽中有酒何妨醉，篋裏無金未是貧。<br><u>但看故鄉榮達者，算來多葬北邙塵。</u> |
|--|--|---|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東壁詩前句的出處待考，後句出自唐代陳上美〈咸陽有懷〉，詠嘆咸陽一地的秦朝宮苑與漢代陵墓。西壁詩出自唐代杜甫與北宋初潘閬(?-1009)詩作，文字略有更動。這兩首集句詩分別書寫於墓室的東、西壁，內容也彼此呼應：一詠咸陽的秦苑漢陵，一詠蜀地諸葛祠堂與洛陽北邙葬地，緊扣喪葬主題。

#### 4. 牌調曲文

墓室墨書以五言或七言詩歌最常見，但在前述侯馬張氏墓中，西壁是蘇軾的七言詩，其餘三壁則相當特殊。墨書句子長短不一，末尾皆有宮調、曲牌名稱，如：〈道宮·解紅〉與〈般涉·沁園春〉。過去認為是佚失的成套諸宮調唱詞，近來研究指出，此三支應該是民間所傳唱單個牌調的曲文，這些曲文不見於文獻記載，為金代北方戲曲增添了新材料。<sup>68</sup>

現存的諸宮調作品均出現於金章宗(1189-1208 在位)之時的晉南，包

<sup>68</sup> 廖奔根據金元時期磁州窯枕上的墨書曲辭指出，侯馬張氏墓所見為可單獨演唱的曲辭，並非成套之諸宮調。相關研究見楊及耘、高青山，〈侯馬二水 M4 發現墨筆題寫的墓志和三篇諸宮調詞曲〉，頁 1-5。三支曲文的內容與討論，見延保全，〈侯馬二水 M4 三支金代墨書戲曲釋疑〉，《中華戲曲》，2003：2(臨汾，2003)，頁 6-21；寧希元，〈早期諸宮調歌詞的重大發現〉，《中華戲曲》，2004：2(臨汾，2004)，頁 12-24；廖奔，〈誤讀的諸宮調「重大發現」〉，頁 185-206。

括董解元的《西廂記諸宮調》與平水(今山西臨汾)刊刻的《劉知遠諸宮調》。侯馬張氏墓中以墨書曲文作為壁面主要裝飾，此為目前所僅見，可能出自墓主個人或家族愛好，也可見地方戲曲之流行。

總結前述四類墨書詩歌曲文，多半出現在墓室壁畫的屏風或掛軸之上(圖 10)，裝裱細節描繪得相當寫實，有如人間居室的再現，可能反映當時經濟菁英以書法作為廳堂裝飾的情況。<sup>69</sup>如晉中榆次孟選墓壁畫，彩繪一對書法掛軸，形式為所謂的「宋式裱」或「宣和裝」，畫心為唐人絕句，上、下有天頭、地頭，天頭上有兩條垂直向下稱為「驚燕」的帶子(圖 11)。除了彩繪書法掛軸，有時也有掛軸畫，如：山西陵川玉泉武珪(1104-1169)夫婦合葬墓中，東、西兩壁分別彩繪對稱的花鳥掛軸三幅，畫風講究(詳後節)，天頭上也有兩條驚燕帶。<sup>70</sup>表 3 長治壺關上好牢金代 M1 壁面上除了有多段詩歌題記，後室牆壁還畫著多幅人物畫掛軸。<sup>71</sup>太原王家莊金元之際的壁畫墓，東北壁畫著寫有「雪庵安樂堂」的門匾，兩側各繪一幅墨竹掛軸。<sup>72</sup>這些墓室壁畫均從側面反映，金代華北地區有些殷實之家好以書法、繪畫裝飾居宅。

目前所見的墨書詩歌曲文集中出現於山西，山東、河北、陝西也見數例。<sup>73</sup>山東高唐金代信武將軍騎都尉虞寅(1115-1197)墓，壁畫有書

<sup>69</sup> 楊愛國曾對墓中的詩歌裝飾進行初步討論，認為這反映宋代世俗社會對「詩書人家」的追求，見楊愛國，〈墓壁題詩——中國古代墓葬詩歌裝飾初探〉，《中國美術研究》，2016：1(上海，2016)，頁 4-10。

<sup>70</sup>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陵川縣文物局，〈山西陵川玉泉金代壁畫墓發掘簡報〉，《文物》，2018：9(北京，2018)，頁 22-32。

<sup>71</sup> 楊林中、王進先、暢紅霞、王偉、李永杰，〈山西壺關縣上好牢村宋金時期墓葬〉，《考古》，2012：4(北京，2012)，頁 48-55。

<sup>72</sup>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市王家庄金元壁畫墓發掘簡報〉，《文物世界》，2016：3(太原，2016)，頁 3-5。

<sup>73</sup> 聊城地區博物館、陳昆麟，〈山東高唐金代虞寅墓發掘簡報〉，《文物》，1982：1(北京，1982)，頁 49-51；李方玉、龍寶章，〈金代虞寅墓室壁畫〉，

法屏風，不過畫面斑駁，難以識別文字內容。<sup>74</sup>濟南一座墓中出土北宋「嘉祐通寶」二枚，但根據甬道題記「泰和元年[1201]九月十三日葬畢」，確定為金代後期墓葬，該墓同樣在墓主畫像後方裝飾書法屏風，從規格化的筆畫看來，應為畫工信筆之作。<sup>75</sup>

山西之外，最令人矚目的是陝西韓城盤樂村的一座醫者墓。<sup>76</sup>該墓的壁畫品質精良，北壁描繪墓主端坐於屏風之前，身旁有侍僕備藥與煎藥的場面(圖 12)。畫面中不但標出醫書《太平聖惠[惠]方》，還有標著「大黃」、「白朮」的藥包，墓主應是一位醫者。<sup>77</sup>墓主背後的書法屏風寫著五言與七言詩歌各一。由於發表的圖像不清，以下錄文根據康保成與孫秉君，並將出處整理如表 4。<sup>78</sup>

此墓沒有墓誌，考古報告根據女墓主手握的「熙寧元寶」銅錢，將年代訂為北宋，此點值得商榷。以銅錢斷代的作法必須謹慎為之，銅錢只能判斷墓葬的年代上限，無法斷定其下限。韓城墓所出的北宋「熙寧元寶」也見於南宋、金、元時期墓葬，以元墓為例，目前所見

《文物》，1982：1(北京，1982)，頁 52-53；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北井陘縣柿莊宋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62：2(北京，1962)，頁 36；陝西省考古研究院，〈2009 年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調查發掘新收穫〉，《考古與文物》，2010：2(北京，2010)，頁 3-13。

<sup>74</sup> 聊城地區博物館、陳昆麟，〈山東高唐金代虞寅墓發掘簡報〉，頁 49-51；李方玉、龍寶章，〈金代虞寅墓室壁畫〉，頁 52-53。

<sup>75</sup> 濟南市博物館、濟南市考古所，〈濟南市宋金磚雕壁畫墓〉，《文物》，2008：8(北京，2008)，頁 33-54。

<sup>76</sup>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2009 年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調查發掘新收穫〉，頁 3-13。

<sup>77</sup> 康保成、孫秉君，〈陝西韓城宋墓壁畫考釋〉，《文藝研究》，2009：11(北京，2009)，頁 79-88。Jeehee Hong and TJ Hinrichs, "Unwritten Life (and Death) of A 'Pharmacist' in Song China: Decoding Hancheng Tomb Murals," *Cahiers d'Extrême-Asie* 24 (2015): 231-278.

<sup>78</sup> 康保成、孫秉君，〈陝西韓城宋墓壁畫考釋〉，頁 80。

表 4 陝西韓城盤樂村醫者墓壁畫屏風詩歌內容與出處

|    | 詩句內容                                    | 出處   |
|----|---|--|
| 詩1 | 古寺青松老，高僧白髮長，<br>夜深禪定後，明□□如霜。<br>要□□□□…… | 不明   |
| 詩2 | 琴劍□□□鶴虎，逍遙□托永無愁，<br>□騎白鹿游三島，悶駕青□□九州。    | 呂巖(洞賓)，《金丹詩訣》： <sup>79</sup><br>琴劍酒碁龍鶴虎，逍遙落魄永無憂，<br>閒騎白鹿遊三島，悶駕青牛看十洲。<br>碧洞遠觀明月掌，青山高隱伴雲流，<br>時人若要還如此，名利華浮即便休。 |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熙寧元寶」也見於南宋、金、元時期墓葬，以元墓為例，目前所見就超過 30 座。<sup>80</sup>前述山東濟南金泰和元年墓也出土了二枚北宋嘉祐通寶，但從墨書可知為金代墓葬無疑。金墓多見北宋銅錢的情況，應該與當時的鑄幣政策有關。根據《金史·食貨志》記載，金代前期仍使用遼、宋

<sup>79</sup> 呂巖(呂洞賓)，《金丹詩訣》(收入《寶顏堂秘笈》，明萬曆繡水沈氏尚白齋刻本)，卷上，頁 14b。「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321^203995465^809^^^0518080000061^@@@1414598278#top>，擷取日期：2019 年 11 月 14 日。

<sup>80</sup> 此處僅舉十四世紀的三座元代紀年墓為例，見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元鐵可父子墓和張弘綱墓〉，《考古學報》，1986：1(北京，1986)，頁 95-114；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石家莊後太保村史氏家族墓發掘報告〉，《河北省考古文集》，第 1 輯(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頁 344-369；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西安曲江元代張達夫及其夫人墓發掘簡報〉，《文物》，2013：8(北京，2013)，頁 27-48。



與劉齊(1130-1137)舊錢，直到正隆三年(1158)才開始鑄造當朝錢幣，與舊錢並行。<sup>81</sup>由此可知，以銅錢判斷墓葬年代，證據並不充分。從本文所整理的紀年資料來看，華北地區在入金後才流行以可識讀的書法屏風裝飾墓室，韓城墓的年代應該也相去不遠，屬十二世紀中後期之作。

北宋時期社會上層階級流行使用屏風，經常設於廳堂之上、主人座位後方，以凸顯其地位，如北宋晚期的風俗畫《清明上河圖》便有幾個場景描繪著書法屏風。<sup>82</sup>屏風上的裝飾除了顯示主人喜好，也傳達其所欲營造的自我形象。如傳世宋代人物畫經常在士大夫文人身後繪製山水屏風，以傳達主人翁的山林之志，山水屏風因而成為文人代表。<sup>83</sup>從這個角度來看，山西地方菁英在墓中裝飾詩歌屏風與掛軸，並倩能書之人入墓書寫，藉此想營造何種家族形象？山西金代墓葬累計至今超過 170 座(參下節圖表 1)，墓主多屬地方上的富商土豪，當中帶有詩文書法裝飾的比例相當低，很可能是墓主家族展示自身文化修養的一種方式，藉此與其他經濟菁英相區別。至於這些家族是否稱得上是文化菁英，還有待進一步分析。

以詩歌與長篇文字裝飾墓室，除了凸顯少數地方菁英的喜好，也顯示墓室營造人員的文字能力較過去提高。這些書法文字清晰可辨，

<sup>81</sup> 脫脫等，《金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卷 48，頁 1069。「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321^203995465^802^^8020202200020029000100010001@@@1716813948#top>，擷取日期：2020 年 8 月 31 日。

<sup>82</sup> 曹星原認為《清明上河圖》為神宗時期的產物，此說法尚有爭議，不過書中注意到圖卷中的許多細節，書法屏風背屏主要見第八章：曹星原，《同舟共濟——《清明上河圖》與北宋社會的衝突妥協》(臺北：石頭出版，2011)，頁 155-177；詹寬，〈從清明上河圖談宋代書法與市民生活〉，《南京藝術學院學報(美術與設計版)》，2014：1(南京，2014)，頁 80-83。

<sup>83</sup> Wu Hung, *The Double Screen: Medium and Representation in Chinese Paint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134-199.

書體介於楷、行之間，書寫流暢自然，書寫者顯然通曉文墨，文字能力超過一般的功能性識字者。他們應該也對通俗詩歌與文學有一定熟悉，能從中擷取佳句，甚至有能力為墓葬創作文句，如：「墓有重開之日，人無再少之顏」。這幾座以墨書詩文為飾的墓中，侯馬牛村墓室北壁有題記「張中解造外宅，空祖代傳，名撒四方……」，可知由張中解負責營造。「外宅」意為別宅，此處指陰宅，河南洛陽新安宋四郎墓宣和八年(1126)題記，也稱墓葬為外宅。<sup>84</sup>張中解這位造墓者不僅在墓中留下個人題記，還宣揚自己的技術與名聲，顯示金代山西砌墓行業不僅文字能力提高，自我意識也上升了。

這些改變令人不禁好奇：宋、金鼎革對山西社會帶來什麼影響？墓葬裝飾所見造墓人的文字水準提升應如何解釋？以下將考察範圍擴大至北宋所轄的華北地區，觀察由宋入金後的變化。

#### 四、技藝人才的移動

金以極快的速度滅遼侵宋，將華北各地納入統治。本節整理考古出土遼、北宋、金三國的華北墓葬，地理範圍包括今日的河北(包含北京與天津)、河南、山東、山西、陝西五省。除了河北與山西二省北部原為遼領土，此華北五省大部分地區在戰後由宋入金，可觀察宋、金易代所帶來的改變。

圖表 1 統計華北五省遼、北宋、金三國的墓葬總數，墓葬集中地與

---

84 此時已改元，但題記仍沿用舊年號，見葉萬松、余扶危，〈新安縣石寺李村的兩座宋墓〉，《中國考古學年鑒》，1985(北京，1985)，頁 173；謝虎軍，〈靖康元年(1126 年)宋四郎墓〉，收入謝虎軍、張劍編著，《洛陽紀年墓研究》(鄭州：大象出版社，2013)，頁 646-648。

各國政治、經濟與文化中心大致重合，也大體符合人口分布情況。<sup>85</sup>遼墓集中於內蒙古與東北，不過此部分不在本文討論之列；其次是河北，此地屬燕雲十六州，為遼五京之一的南京燕京所在，也是漢人集中地區，後來為金中都所在。宋墓集中在河南，此地是宋國的兩京所在——東京汴京與西京洛陽——也是帝國樞紐。金墓則以山西數量最多，其次是河北，河南大幅減少。其中山西與河北的北部屬遼舊境，南部為宋舊境，此二地在遼、宋並立時為國家邊陲，入金後成為腹心，得到充分發展，不僅人口集中，進士官僚也多半來自於此，過去研究者已有不少討論。<sup>86</sup>

宋金戰後，原屬宋舊境的華北地區，以河南與山西南部兩地的相對變化最劇烈。北宋時河南為帝國樞紐，半數以上墓葬集中於此；進入金代，河南大幅萎縮，山西則異軍突起，在戰後成為墓葬集中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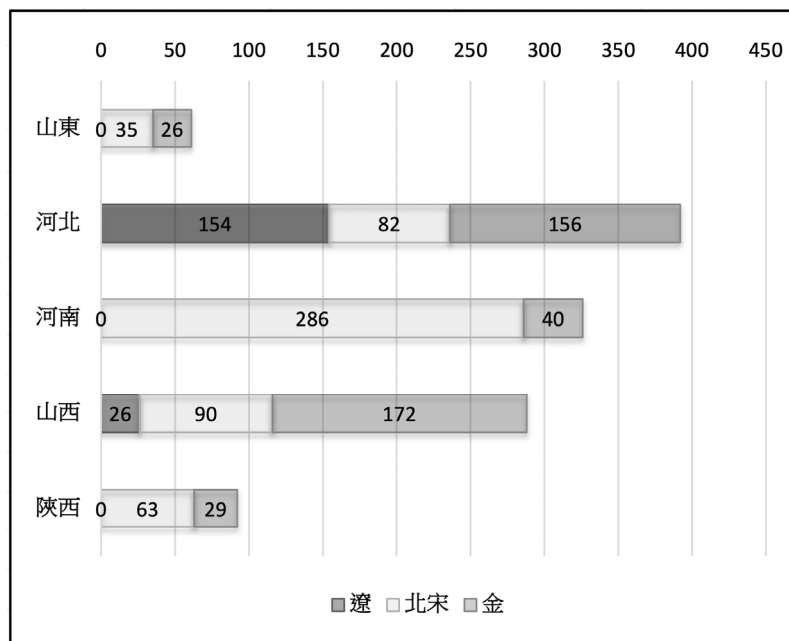
### 圖表 1 華北五省墓葬總數(統計至 2021/12/7)<sup>87</sup>

<sup>85</sup> 吳松弟著，葛劍雄主編，《中國人口史》，第3卷，遼宋金元時期(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

<sup>86</sup> 河北、山西為金代進士的主要產地，而河北又是出高級官僚的地點，宰執多出於此。見陳昭揚，〈金代漢族士人的地域分布——以政治參與為中心的考察〉，《漢學研究》，26：1(臺北，2008)，頁103-135。相關討論又見飯山知保，〈金代科舉制度變遷與地方士人〉，《科舉學論叢》，2010：1(上海，2010)，頁12-27。關於金代華北各區域的重要性，見任萬平，〈論金代文化區域結構〉，收入陳述主編，《遼金史論集》，第5輯(北京：文津出版社，1991)，頁237-254；喬新華，〈從武到文——宋元時期山西地域角色變化及其原因探討〉，《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1：2(太原，2008)，頁132-136。

<sup>87</sup> 此圖表資料統計自建置中的「遼宋金墓葬資料庫」，由於墓葬總數超過千筆，為避免冗長之附錄，改以電子檔附加文件，供讀者檢閱覆核。本表僅整理年代較為確定之墓葬，考古報告籠統訂為兩宋、遼至金、北宋至金、

|    | 遼   | 北宋  | 金   |
|----|-----|-----|-----|
| 山東 | 0   | 35  | 26  |
| 河北 | 154 | 82  | 156 |
| 河南 | 0   | 286 | 40  |
| 山西 | 26  | 90  | 172 |
| 陝西 | 0   | 63  | 29  |
| 總數 | 180 | 556 | 423 |



資料來源：作者統計，墓葬資料表參附錄2。

五代至北宋之墓葬一律不列入統計。

河南的衰落來自戰爭，靖康年間，女真自河北、河東兩路包抄入侵宋國，東西二軍會師於汴京，對京師展開長達數個月的掠奪。<sup>88</sup>靖康之後的戰事，進一步導致此地人口外流、經濟衰退。建炎年間(1127-1130)莊綽在南渡途中行經河南南部鄧縣、許昌、商丘一代，對於當地遭受戰爭浩劫後的破落情況有此描述：「幾千里無復雞犬，井皆積尸，莫可飲；佛寺俱空，塑像盡破胸背以取心腹中物；殯無完柩，大達已蔽於蓬蒿；菽粟梨棗，亦無人采刈。」<sup>89</sup>地處中原核心的河南南部，受戰爭摧毀成為廢墟。宋金之際的瓷枕枕面也有類似內容：「余游於潁水，聞金兵南退，觀路道旁，骨肉滿地，不覺泪下……時在紹興紀元春二月朔日也」，可見河南地在戰後淒慘景象。<sup>90</sup>事實上，開封的破落與蕭條一直持續到金朝末年，在蒙古軍大規模攻擊之下，金於貞祐二年(1214)遷都開封，北方避難人民湧入，人口才回升。<sup>91</sup>

北宋的京城破落了，人口向外徙出。有些在城破時隨著徽、欽二帝被擄而北，有些則隨著高宗朝廷向南逃亡，最後在南方落腳，並留下緬懷中原故都的憶往之作，如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生動地描繪那再也回不去的汴京光華。甚至在入元之後，周密(1232-1298)還追述

<sup>88</sup> 戰爭也導致治安敗壞、民生物資短缺、瘟疫肆虐等，均加速城市敗落，見梁偉基，〈圍城告急〉，頁 57-86。

<sup>89</sup> 莊綽撰，蕭魯陽點校，《雞肋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上，頁 21。「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321^203995465^809^^0301045000061^@@733154845#top>，擷取日期：2020 年 8 月 31 日。

<sup>90</sup> 這類內容的瓷枕共有兩件，一為紹興元年(1131)，另一為紹興三年(1133)，均為私人收藏。相關討論見廖奔，〈磁州窯元白地黑花長方形瓷枕論考〉，《文藝研究》，2019：5(北京，2019)，頁 104-117。

<sup>91</sup> 吳松弟著，葛劍雄主編，《中國人口史》，第 3 卷，遼宋金元時期，頁 214-216。

祖上自山東遷徙杭州的過往事蹟。<sup>92</sup>繁盛的中原故都與戰時亂離，成為南渡士大夫難忘的集體記憶。

河南破敗之後，有些人隨朝廷遷徙南方，應也有不少人就近遷徙至河北與河東。移居山西的有哪些人？出土墓葬提供了一些訊息。山西大同發現道士閻德源(1094-1189)的墓葬，墓誌立於南壁墓道口西側，長 67、寬 49、厚 16.5 公分，共 301 字。<sup>93</sup>首行「西京玉虛觀宗主大師閻公墓誌」(圖 13)，可知閻德源身份。誌文對閻德源的生平經歷有簡要描寫：

……鄉居汴梁也，少而寤道，頓捨塵緣，師事宣和侍晨張公，為職籙道士，命授金壇郎。迨乎上天革命，稽首嚮風，攜塵而來，寓跡此地。既而卜築於京西，興創土木，度集徒眾……由是貴戚公侯，大夫士庶，敬之如神。朝廷累賜師號，為羽流之宗。嗚呼，使太上之教，丕闡于朔方者，先生之力也。

閻德源早年居住在京師汴梁，出家為道士，以宣和侍晨張公為師。張公即張虛白，是宋徽宗倚重的道士，在徽宗朝專為道士而設的道學中擔任侍晨，這是道學的最高職位，閻德源當時還是最低階的金壇郎。<sup>94</sup>張虛

92 周密撰，張茂鵬點校，《齊東野語》(北京：中華書局，1983)，〈自序〉，頁 4；周密撰，吳企明點校，《癸辛雜識》，後集，頁 73。

93 大同市博物館，〈大同金代閻德源墓發掘簡報〉，《文物》，1978：4(北京，1978)，頁 1-13。

94 張虛白生平見張宇初、邵以正、張國祥編纂，《正統道藏》(臺北：新文豐，1985，上海涵芬樓影印本)，洞真部記傳類，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 51，第 8 冊，頁 758b-759a；丁傳靖輯，《宋人軼事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1)，卷 2，頁 57。徽宗朝道學官職，見宋綬，宋敏求編，司義祖校點，《宋大詔令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 224，〈改定道階等御筆手詔〉，頁 865-866。以上均擷取自「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321^203995465^802^^^8030400100020010000700540001@@@1119631359#top>；<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

白除了有預言能力，也通醫術，女真人聽說張虛白的名聲，入汴後，爭相以肩輿迎接，把他當作神仙一般。

宋金戰後，張虛白與閻德源均滯留北方，未隨朝廷南遷。閻德源從汴京移居西京大同府，在此宣道，受到貴戚公侯士庶之敬重，朝廷累次賜加師號。現存宮觀碑誌資料中，有一則金世宗大定十四年(1174)重修中都(今北京)天長觀之記錄，宮觀修成時，金世宗曾召閻德源提點觀事，當時他的銜稱為「西京路傳戒壇主清虛大師」。<sup>95</sup>墓誌的稱號為「西京玉虛觀宗主大師」，可見誌文所說「朝廷累賜師號」不是虛詞。宋金鼎革時，閻德源年方三十出頭，在徽宗道學中位列最低品階，入金六十多年才是他道士生涯的高峰，他的人生成就在移居大同之後才開展。

墓葬中有幾方印章，印文分別為：「龍山道人」、「天長方丈老人」、「玉虛丈室老師」、「青霞子記」。當中「天長」、「玉虛」應是金代皇家所支持的天長觀與玉虛觀。作為一位地位隆顯的高級道士，閻德源的墓葬也有別於流俗，沒有彰顯世俗富貴的磚雕壁畫，而是在墓室兩側擺放屏風，加上豐富隨葬品：棺槨前三方供桌分別擺設陶瓷供器、漆木明器傢俱、道冠道書。棺槨共兩重，棺內的閻德源身著繡著仙鶴與祥雲的道袍，外層罩覆鶴氅，身旁有象牙戒板，臉面上還覆蓋一片畫有道符的羅紗。<sup>96</sup>

@321^203995465^802^^60213013000300070022@@1047692164#top; <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321^203995465^802^^7020800201018006700010003@@991383393#top>, 擷取日期：2020年3月10日。

<sup>95</sup> 張宇初、邵以正、張國祥編纂，《正統道藏》，第33冊，頁108b-110a。

「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321^203995465^809^^0304001086958^@@1283736350#top>, 擷取日期：2020年3月10日。

<sup>96</sup> 白彬由此推測閻德源為傳統符籙派道士，關於山西金元道士墓的特點與他們所屬道派，見白彬，〈山西地區金元道士墓研究〉，收入黎志添編，《道

女真人入中原後，似乎對道士有所戒懼，有條資料記載女真軍隊進入睢陽時，見道士奔走迴避，連忙阻止說：「汝輩多異人，無敢傷也。」<sup>97</sup>可見道士這個行業由於精通神仙之術，即使統治者易主，仍能以道術事奉新的統治階層，生計前途無虞。

另一個從宋廷改事金廷的例證來自山西繁峙巖山寺的金代壁畫。巖山寺位於五台山麓，原名靈巖寺，清代改名巖山寺。金正隆三年(1158)曾經大規模整建，南殿文殊殿壁畫為金代所繪，西壁的壁畫南端上方有施主姓名，後有畫人題記：「大定七年[1167]前□□二十八日畫了，靈巖院普□□，畫匠王達年陸拾捌，并小起、王輝、王琮、福喜、潤喜。」由此可知，負責的畫匠名王達(1100-1167以後)，年紀六十八歲。<sup>98</sup>寺廟另存一方正隆三年水陸記碑文，稱王達為「御前承應畫匠」，可知王達曾供職金廷。<sup>99</sup>由題記內容推算，王達生於1100年，汴京傾覆時已二十八歲。研究者注意到巖山寺壁畫在宮殿與建築描繪方面，與《清明上河圖》有近似之處，為北宋傳統之延續，推論王達應該是出身北宋畫院，宋亡後進入金代宮廷供事。<sup>100</sup>

---

教圖像、考古與儀式——宋代道教的演變與特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6)，頁123-163。

<sup>97</sup> 張宇初、邵以正、張國祥編纂，《正統道藏》，第8冊，頁759a。「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321^203995465^801^^203040^%E6%AD%A3%E7%B5%B1%E9%81%93%E8%97%8F@@100378490#top>，擷取日期：2020年3月10日。

<sup>98</sup> 山西省古建築保護研究所、柴澤俊、張丑良編，《繁峙巖山寺》(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頁210。

<sup>99</sup> 山西省古建築保護研究所、柴澤俊、張丑良編，《繁峙巖山寺》，頁60、214。

<sup>100</sup> 山西省古建築保護研究所、柴澤俊、張丑良編，《繁峙巖山寺》，頁25；傅熹年，〈中國古代的建築畫〉，《文物》，1998：3(北京，1998)，頁75-94；孟嗣徽，〈巖山寺佛傳壁畫圖像內容考釋——兼及金代宮廷畫家王達



文獻記載，汴京城破時，許多北宋宮廷的技藝人才、工匠、倡優、醫者等被擄至北方，為金代宮廷服務。<sup>101</sup>閻德源與王達不知是被擄、還是自行逃難，總之他們最後在河東落腳，改事金廷。由此可知，技藝人士由於一技在身，不必依附趙宋朝廷，改朝換代對他們的衝擊較小。應有不少人在河南殘破後，遷徙至鄰近的河東與河北地區。圖表 1 的墓葬統計以及《金史·地理志》各路戶口統計，均顯示河東南、北路在戰後成為金朝境內戶口最集中之地，成為經濟文化中心之一。<sup>102</sup>來自河南的技藝人士，帶來北宋汴京的藝術與文化，促進河東地區入金後的文化發展。

在此情況之下，有些山西金墓的壁畫風格，與現存北宋宮廷繪畫有相似之處，也就不足為奇了。武珪(1104-1169)夫婦墓位於長治南方的陵川玉泉，墓室四壁裝飾著罕見的高品質壁畫，其中北壁屏風與東、西兩壁掛軸都帶有明顯的北宋宮廷風格。<sup>103</sup>北壁二面壁畫屏風題材均為樹下高士，平遠的構圖與挺拔彎曲的松樹姿態，皆具有李成、郭熙一派的山

---

的創作活動》，《故宮學刊》，2(北京，2005)，頁 320-367(特別是頁 358-367)。

<sup>101</sup>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 77，「金人求索諸色人」，頁 583b-584a。「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321^203995465^809^^^0207001001014^@@@397681442#top>，擷取日期：2020 年 9 月 28 日。脫脫等，《宋史》，卷 23，頁 436。

<sup>102</sup> 金代戶口統計見《金史·地理志》，不少學者曾以此討論河東南、北路的重要性，早期如譚其驤，〈山西在國史上的地位〉，《晉陽學刊》，1981：2(太原，1981)，頁 2-8。不過該記錄高估了南京路(今河南)的人口，見吳松弟著，葛劍雄主編，《中國人口史》，第 3 卷，遼宋金元時期，頁 214-216。

<sup>103</sup>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陵川縣文物局，〈山西陵川玉泉金代壁畫墓發掘簡報〉，頁 22-32。

水畫特點(圖 14)，郭熙乃宋神宗(1067-1085 在位)最欣賞的畫家。<sup>104</sup>東、西兩壁畫著鵲鳥登枝掛軸三幅(圖 15)，雖然斑駁，仍可見以雙鉤填彩描繪的鵲鳥，立於竹葉與花卉之間。從花鳥題材、聚焦的構圖、到寫實自然的風格，均具有徽宗朝花鳥畫特點。<sup>105</sup>傳說徽宗曾以「萬年枝上太平雀」為題，試畫院諸生，此幅花鳥畫可能即為此畫題的一種表現。<sup>106</sup>

從墓誌可知，武珪世為陵川大族，沒有功名，不過替他寫墓誌的姪男武大用是進士。武珪壯年正值宋金鼎革之時，不知何以能夠「與三昆共開後利，愈大前基」，家族產業不但不受政權交替影響，反而益發興旺。<sup>107</sup>或許武家也與第一節提到的長治安昌崔家一樣，成為女真政權的協力者，只是墓誌隱去了其中細節。

晉南的武珪墓壁畫品質精良，帶有明顯的北宋宮廷遺風，類似例證還見於山西臨汾郝家溝金大定二十二年(1182)墓。男、女墓主畫像背後均繪有一大面山水屏風，為平遠構圖，其中女墓主後方屏風還依稀可見李郭派的蟹爪樹枝。<sup>108</sup>除了河東地區，河北金墓也可見北宋宮廷

<sup>104</sup> 關於北宋中、後期宮廷與士大夫所好尚的山水畫風，見石守謙，《山鳴谷應——中國山水畫和觀眾的歷史》(臺北：石頭出版，2017)，頁 43-73；神宗對郭熙畫的欣賞，見曹星原，《同舟共濟》，頁 148-150。

<sup>105</sup> 關於徽宗朝花鳥畫之研究，特別是作為祥瑞的象徵，參 Peter C. Sturman, "Cranes Above Kaifeng: The Auspicious Image at the Court of Huizong," *Ars Orientalis* 20 (1990): 33-68; Maggie Bickford, "Emperor Huizong (1082-1135, r. 1100-1126) and the Aesthetic of Agency," *Archives of Asian Art* 53 (March 2002): 71-104.

<sup>106</sup> 方勺撰，許沛藻，楊立揚點校，《泊宅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 1，頁 4。「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321^203995465^809^^^0301043000008^@@@1019322017#top>，擷取日期：2020 年 9 月 8 日。

<sup>107</sup>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陵川縣文物局，〈山西陵川玉泉金代壁畫墓發掘簡報〉，頁 31。

<sup>108</sup>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汾西縣文物旅遊局，〈山西汾西郝家溝金代紀年壁畫

繪畫之遺緒，如 1960 年代發掘的河北石家莊井陘縣柿莊 M6，當初訂為北宋末年至金初，現在一般認為是金代墓葬。<sup>109</sup>壁畫有一場景描繪兩名女子拉開布匹熨燙，構圖與傳為宋徽宗的《搗練圖卷》(藏於美國波士頓美術館)相同，只是民間氣息濃厚，繪畫品質遠不如武珪墓細緻，當然也無法與徽宗宮廷繪畫相媲美。前述河東、河北的例證顯示，這些繪畫題材很可能是由來自河南的前朝畫家所引入，在地方發展的結果。

來自河南的高級技藝人才，除了促進山西的文化發展，似乎也提升了技藝人才的社會地位。北宋後期，徽宗曾為技藝人士開設官學，納入國子監，包括：道學、算學、醫學、書學與畫學，並設有博士，以教導學生。<sup>110</sup>這個新制度除了精進他們的技能，同時也提高他們的詩文修養，在繪畫上造成畫風的轉變。<sup>111</sup>徽宗末年出現砌墓人自稱「博士」的例證：河南洛陽新安宣和八年宋四郎墓，磚銘上有「磚作人賈博士、劉博士」稱號。<sup>112</sup>入金後，華北各地延續此風，目前所見有數例，包括前述山西長治故漳魏村天德三年(1151)墓、<sup>113</sup>山東濟南明昌三

墓發掘簡報》，《文物》，2018：2(北京，2018)，頁 19，圖 17、18。

<sup>109</sup>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北井陘縣柿莊宋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62：2(北京，1962)，頁 31-73。圖像見《中國墓室壁畫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墓室壁畫全集》，第 3 冊，宋遼金元，頁 113，圖 153。

<sup>110</sup> 脫脫等，《宋史》，卷 157，頁 3686-3690。

<sup>111</sup> 余城，〈北宋畫院制度與組織的探討〉，《故宮學術季刊》，1：1(臺北，1983)，頁 69-96；李慧淑，〈宋代畫風轉變之契機——徽宗美術教育成功之實例(上)、(下)〉，《故宮學術季刊》，1：4(臺北，1984)，頁 71-92；2：1(臺北，1984)，頁 9-36。

<sup>112</sup> 謝虎軍，〈靖康元年(1126 年)宋四郎墓〉，頁 646-648。廣東曾出土一件火葬的陶罈，上刻有「紹聖四年(1097)四月十六日鍾博士謹記」，時代更早，但銘文過於簡短，無法確定鍾博士是否為喪葬從業人員。南雄縣博物館，〈廣東南雄宋代陶罈墓〉，《考古》，1984：7(北京，1984)，頁 601。

<sup>113</sup> 長治市博物館，〈山西長治市魏村金代紀年彩繪磚雕墓〉，頁 59-64。

年(1192)墓。<sup>114</sup>

最特殊的是陝西延安甘泉一座金明昌七年(1196)墓葬，甬道上有一位老者半身肖像，作白描風格，僅於臉部敷色，與一般墓室壁畫常見的彩繪全身人物像不同。一旁有榜題「此是李孛[博士]」(圖 16)，考古報告推測此人可能是負責的工匠。<sup>115</sup>由於工匠的造墓記錄經常題寫於甬道，加上造墓人在金代華北有時被稱作「博士」，此說有理。此例證也顯示金代造墓人一類的技藝人士社會地位提高，除了在墓中題寫文字宣揚自己的技藝，還將自身形象繪於墓室甬道，帶有商標的味道。金代華北造墓人的地位提升，不知與徽宗為工藝技能設立官學與博士是否有關？戰爭之後，這些高級技藝人才從汴京四散，將其技能帶到河東與河北諸地，使得北宋汴京風格如漣漪般與各地文化交互激盪，也促進技藝人士的社會地位提升。

## 五、結語

譚其驤早年曾就山西在歷史上的地位進行跨朝代的觀察，強調歷史上的分裂時期，使得地勢居高臨下的山西，掌握戰略位置，成為重要的軍事據點，同時也是草原人群進入農業社會的重要關口。<sup>116</sup>宋金戰後，原屬遼代的晉北與原屬北宋的晉中與晉南，全境均為女真所有。從政治地理來看，入金後，山西不再是兩軍對峙的前線，軍事戰略地位下降，轉而在經濟與文化版圖中佔有重要位置，成為帝國腹心。戰

---

114 濟南市博物館、王建浩，〈濟南市區發現金墓〉，《考古》，1979：6(北京，1979)，頁 507-509。

115 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甘泉縣博物館，〈陝西甘泉柳河渠灣金代壁畫墓發掘簡報〉，《文物》，2016：11(北京，2016)，頁 40-50。

116 譚其驤，〈山西在國史上的地位〉，頁 2-8。

爭改變了華北各地的相對區位關係，河東成為金代經濟、文化、宗教的中心，各方面均有長足發展，雜劇興盛，刻書業發達，道教也得到發展。從本文討論可知，山西之所以能在戰後重新盤整，迅速崛起，與鄰近的河南中原人才移入有密切關係。

宋金戰爭使河南成為重災區，人群大規模向外徙出，各階層的命運似乎有些不同。士大夫官員的家族命運與國家興衰休戚與共，有些連同徽、欽二帝被擄至東北，有些追隨高宗播遷南方，遷徙過程的艱辛見諸文集與筆記記載。地方家族的命運各地差異甚大：戰場上的家園被破壞，人民向各處逃難；離主戰場稍遠的，尚能守住家園，因應現實謀求出路；有些還因女真軍隊屯駐，治安較佳，成為逃難者的避難所。本文第一節所分析的考古墓葬，從墓壁上的墨書題記與墓誌銘可見地方家族與市井小民面對戰爭的徬徨與抉擇。

入金後，山西墓葬出現大量墨書文字，成為最具特色的新發展。有些節選自通俗詩歌戲曲，書寫於壁畫屏風或書法掛軸之上；也有的在孝子故事圖像旁抄寫長篇孝子傳，圖文左、右對照，宛如通俗的全相讀物一般。這些現象顯示，有更多通曉文字之人參與墓室營造與裝飾，無論是集錄古今詩聯，或是親臨現場提筆在墓壁上書寫。許多砌墓的匠師在墓中留下自己的名字，有時自我標榜高超的造墓技術，甚至在入口處畫上自己的肖像，墓室營造這個行業在金代的社會地位似乎上升了。

這個現象與戰爭帶來的人群流動有關，特別是從北宋文化核心所徙入的高級技藝人才。這些擁有特定才能的技藝人士，不少原來在北宋宮廷服務，戰爭中有的被擄至北方為金廷工作，有的轉徙至南北各地，憑藉所長自營生計。宋金戰後，山西成為華北重要的避風港，從河南移入的技藝人才帶來了北宋首都流行的文化與藝術風格。不少北宋官修的技藝類書籍也在晉南的平陽重刻，如大定二十四年(1184)畢履

道刊《圖解校正地理新書》與泰和四年(1204)張存惠晦明軒刊《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在某種程度上，金代山西可說是承接了北宋河南的技藝與文化繼續發展。

人才移入是促成宋、金之變的一項重要因素，但無法完全解釋山西社會在戰後出現的變化。本文觀察到的一些現象，可供未來繼續探討。首先，在政權交替之時，政治出現真空，地方勢力重新盤整，有些家族趁機崛起成為新的地方菁英，華北磚雕壁畫墓不少應即屬此階層。其次，大量的磚雕壁畫墓中，僅少數描繪書法詩聯或繪畫掛軸，這表示經濟菁英內部有所分化，有些家族特別偏好以象徵文化修養的詩文書畫作為裝飾。若能針對華北磚雕壁畫墓的墓室裝飾與隨葬品進行整體分析，應有助了解入金後地方勢力的發展，進而掌握經濟菁英的文化面貌。

最後，有些金墓墨書文字相當工整，有如士人墓誌一般，這些書法的提筆者，除了較高級的技藝人才，是否也可能是沒有功名的低階士人？過去學者討論兩宋士人對卜算風水等小道的態度，提到有些士人也投入這些行業，甚至憑藉其專業知識與儒士交鋒，提升自我的社會地位。<sup>117</sup>墓葬與地理風水息息相關，山西金墓所見的新發展，是否也與浮沈於金代社會中的士人有關？入金後華北士人的命運，是一個牽涉面向廣泛的課題，此處僅能提出假設性提問，以待未來解答。

(本文於 2020 年 9 月 11 日收稿；2020 年 12 月 22 日通過刊登)

\* 本文初稿發表於 2019 年 12 月 20 日清華大學主辦的「宋代文

<sup>117</sup> 廖咸惠，〈體驗「小道」——宋代士人生活中的術士與術數〉，《新史學》，20：4(臺北，2009)，頁 1-58；劉祥光，《宋代日常生活中的卜算與鬼怪》(臺北：政大出版社，2013)。

獻新視野」國際學術研討會，感謝與會學者的批評指教。此外，特別感謝黃士珊(Shih-shan Susan Huang)教授閱讀本文初稿，提出許多建設性的意見；也衷心感謝審查人不吝指正，提高了文章的正確性。本研究是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人文研究的數位化——從個別研究到整合平台：遼宋金墓葬與文化」(MOST 105-2420-H-002-053-MY3)的部分成果。

圖1 墓室東壁墨書，山西屯留宋村宋榮墓，金天會十三年(1135)



資料來源：王進先、楊林中，〈山西屯留宋村金代壁畫墓〉，《文物》，2003：3(北京，2003)，頁45，圖3、4。



圖2 墓室西壁墨書，山西屯留宋村宋榮墓，金天會十三年  
(11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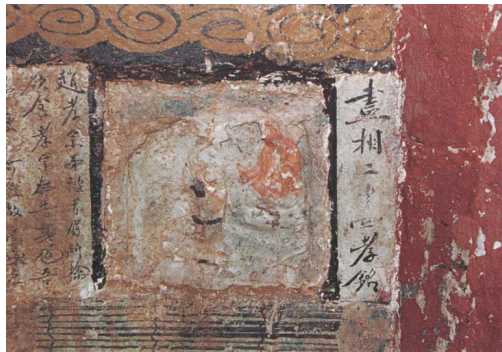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王進先、楊林中，〈山西屯留宋村金代壁畫墓〉，頁45，圖5。

圖3 故崔君墓誌銘，山西長治安昌村崔晟與張氏夫婦墓，金皇統三年(1143)



資料來源：商彤流，〈長治市安昌村出土的金代墓葬〉，《藝術史研究》，6(廣州，2004)，頁418，圖32。

圖4 「畫相二十四孝銘」，山西長治魏村紀年墓，金天德三年(1151)



資料來源：長治市博物館，〈山西長治市魏村金代紀年彩繪磚雕墓〉，《考古》，2009：1(北京，2009)，圖版 14.1。

圖5 鮑山行孝圖，山西長治魏村紀年墓，金天德三年(1151)



資料來源：長治市博物館，〈山西長治市魏村金代紀年彩繪磚雕墓〉，圖版 14.4。

圖6 南、北壁丁蘭畫像，山西長治魏村紀年墓，金天德三年(1151)



資料來源：長治市博物館，〈山西長治市魏村金代紀年彩繪磚雕墓〉，圖版 14.2、16.4。



圖7 《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元至正14年(1354)，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藏



資料來源：天理大學附属天理図書館編，《開館 69 周年記念展「宋元版」》(奈良：天理大學出版部，1999)，圖 43。

圖 8 壁畫屏風書法，河南白沙趙大翁夫婦墓，北宋元符二年(1099)



資料來源：宿白，《白沙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57)，圖版 5。

圖9 元代鄭擇墓誌背面蘇軾書法與李公麟繪畫，河南洛陽出土



資料來源：陳瑞農、趙振華，〈鄭擇墓誌與李公麟《擁馬醉歸圖》〉，《東南文化》，1991：1(南京，1991)，圖1，頁98。

圖 10 北壁墓主夫婦對坐背後書法屏風，山西長子小關村，金大定十四年(1174)



資料來源：長治市博物館，〈山西長子縣小關村金代紀年壁畫墓〉，《文物》，2008：10(北京，2008)，圖 11、12，頁 65。



圖 11 壁畫書法掛軸，山西晉中榆次孟選墓，金正大五年  
(1228)



資料來源：王俊、閻震，〈山西晉中發現金代正大五年墓〉，《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3：10(北京，2013)，圖3，頁7。

圖 12 墓室北壁墓主畫像，陝西韓城盤樂村醫者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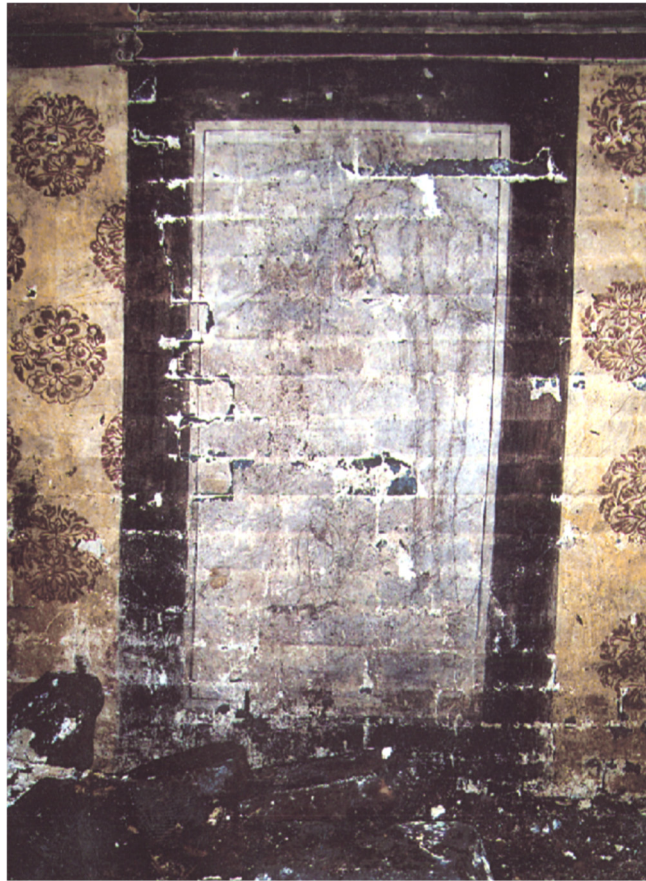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中國墓室壁畫全集》，3 宋遼金元(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11)，圖 128，頁 96。

圖 13 閻德源墓誌拓片，山西大同閻德源墓出土，誌於金大定三十年(1190)



資料來源：大同市博物館，〈大同金代閻德源墓發掘簡報〉，《文物》，1978：4(北京，1978)，圖 11，頁 6。

圖 14 墓室北壁樹下高士屏風壁畫，山西陵川玉泉武珪夫婦墓，金大定九年(1169)



資料來源：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陵川縣文物局，〈山西陵川玉泉金代壁畫墓發掘簡報〉，《文物》，2018：9(北京，2018)，圖7，頁27。



圖 15 墓室東壁鵲鳥登枝掛軸壁畫，山西陵川玉泉武珪夫婦墓，金大定九年(1169)



資料來源：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陵川縣文物局，〈山西陵川玉泉金代壁畫墓發掘簡報〉，圖 9、10，頁 28。

圖 16 甬道李博士畫像，陝西延安甘泉墓，金明昌七年(1196)



資料來源：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甘泉縣博物館，〈陝西甘泉柳河渠灣金代壁畫墓發掘簡報〉，《文物》，2016：11(北京，2016)，圖8，頁43。

## 附錄 1 金墓墨書詩歌曲文整理

| 年代   | 出土地                        | 類型   | 詩文內容   |
|------|----------------------------|------|--|
| 1174 | 長治長子小關村 <sup>118</sup>     | 北壁屏風 | 男：青山只會磨今古，綠水何曾洗□□<br>女：青松映裏□□□，栢樹陰中花□□   |
|      |                            | 東壁屏風 | 男：雨後碧川淨，春來楊柳青，誰家滌洗處，□到賣花□<br>女：春雨□□名利塚，猛風吹破是非墳                                       |
| 1200 | 侯馬二水 M4 張氏墓 <sup>119</sup> | 西壁墨書 | 陰雲忽散曉霜天，晝急門開見墜仙，<br>錦襖綉衣宮□□，玉簪珠汨客三千。<br>閑騎白馬敲金鐙，□□茶樓動管弦，<br>幾度醉歸明月夜，笙歌引至華堂前。<br>孟常君作 |
|      |                            | 南壁墨書 | 樹遠蟬聲細，堂高鶯語輕[不全]  |
|      |                            | 南壁墨書 | 誰家深院裏，高叫賣花聲[不全]  |
|      |                            | 北壁墨書 | 鶴穿老檜烟籠玉，鶯入榴苑火煉金[不全]  |
|      |                            | 北壁墨書 | 閑思古話，說十大功勞……[下略]〈南呂□□□〉  |

<sup>118</sup> 長治市博物館，〈山西長子縣小關村金代紀年壁畫墓〉，頁 60-69。

<sup>119</sup> 根據墓室北壁墨書葬記，張氏生卒年為 1128 年至 1182 年，死後十九年，家人為其重新修建碑墓。楊及耘、高青山，〈侯馬二水 M4 發現墨筆題寫的墓志和三篇諸宮調詞曲〉，頁 1-5。三支曲文的內容與討論，見延保全，〈侯馬二水 M4 三支金代墨書戲曲釋疑〉，頁 6-21；寧希元，〈早期諸宮調歌詞的重大發現〉，頁 12-24；廖奔，〈誤讀的諸宮調「重大發現」〉，頁 185-206。

|      |                                   |        |                                      |
|------|-----------------------------------|--------|--------------------------------------|
|      |                                   | 南壁墨書   | 自家緣業，這骷髏形骸白如雪[下略]<br>〈道宮·解紅〉         |
|      |                                   | 東壁墨書   | □□□催，百年一□，縱思侍嬌……[下略]<br>〈殷涉·沁園春〉     |
| 1212 | 侯馬牛村<br>M31 <sup>120</sup>        | 門兩側對聯  | 青山只會□今□，淶水何曾□事□                      |
| 1228 | 晉中榆次孟<br>選墓 <sup>121</sup>        | 書法掛軸   | 有客來相問，如何是治生，<br>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         |
|      |                                   | 書法掛軸   | 江動月移石，溪虛雲傍花，<br>鳥棲知故道，帆過宿誰家。         |
| 金    | 長治壺關上<br>好牢村<br>M1 <sup>122</sup> | 東壁題詩   | 松柏蕭蕭夾路青，人人到此盡傷情。<br>秦苑有花空笑日，漢陵無主自侵雲。 |
|      |                                   | 西壁題詩   |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江城外柏森森。<br>君看青史勳業者，算來多葬北邙塵。 |
|      |                                   | 雜劇壁畫題記 | 無窮歌舞今何在，都苑荒蕪伴月明。 <sup>123</sup>      |
| 金    | 高平湯王頭<br>村 <sup>124</sup>         | 壁面題詩   | 墓有重開之日，人無再少之顏。                       |

<sup>120</sup> 楊富斗，〈山西侯馬金墓發掘簡報〉，頁 681-683。

<sup>121</sup> 根據磚買地券訂年，王俊、閔震，〈山西晉中發現金代正大五年墓〉，頁 6-8。

<sup>122</sup> 楊林中、王進先、暢紅霞、王偉、李永杰，〈山西壺關縣上好牢村宋金時期墓葬〉，頁 48-55。

<sup>123</sup> 此聯文字隸定參路方鵠，〈山西上好牢宋金墓壁題詩小考〉，《中華文史論叢》，2014：3(上海，2014)，頁 282。

<sup>124</sup> 劉巖等，〈高平市湯王頭村金代墓葬〉，收入中國考古學會編，《中國考古學年鑒》，2013(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頁 171-172；劉巖、程勇、安建峰、李斌、程虎偉、陳鑫、孫先土、張志偉、皇甫子鉞，〈山西高平



## 附錄2 遼、北宋、金墓葬資料表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8LG5NRox8ZfBLrcGGDjcCMKd\\_RyZDPiG/edit?usp=sharing&ouid=113328372013477882395&rtpof=true&sd=true](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8LG5NRox8ZfBLrcGGDjcCMKd_RyZDPiG/edit?usp=sharing&ouid=113328372013477882395&rtpof=true&sd=true)



---

湯王頭村金代墓葬》，《華夏考古》，2020：6(鄭州，2020)，頁 37-44。

## 徵引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丁傳靖輯，《宋人軼事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1。
- 孔安國，《古文孝經孔氏傳》，收入《知不足齋叢書》，清乾隆鮑廷博校刊本。
- 方勺撰，許沛藻，楊立揚點校，《泊宅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
- 王梵志著，項楚校注，《王梵志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 吳師道，《吳禮部詩話》，收入《知不足齋叢書》，清乾隆鮑廷博校刊本。
- 吳曉鈴等編校，《關漢卿戲曲集》，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8。
- 呂巖(呂洞賓)，《金丹詩訣》，收入《寶顏堂秘笈》，明萬曆繡水沈氏尚白齋刻本。
- 宋綬，宋敏求編，司義祖校點，《宋大詔令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
-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北京：中華書局，1988。
- 李攸，《宋朝事實》，收入《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清乾隆敕刻武英殿聚珍本。
- 李昉等奉勅編，彭叔夏辨證，勞格拾遺，《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66。
- 周密撰，吳企明點校，《癸辛雜識》，北京：中華書局，1988。
- 周密撰，張茂鵬點校，《齊東野語》，北京：中華書局，1983。
- 洪邁撰，孔凡禮點校，《容齋隨筆》，北京：中華書局，2005。
-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張宇初、邵以正、張國祥編纂，《正統道藏》，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上海涵芬樓影印本。
- 脫脫等，《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元至正本配補明成化本。
- 脫脫等，《金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元至正刊本。
- 莊綽撰，蕭魯陽點校，《雞肋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
- 陶宗儀編，《說郛》，上海涵芬樓排印本。
- 趙明誠著，金文明校證，《金石錄校證》，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 趙彥衛撰，傅根清點校，《雲麓漫鈔》，北京：中華書局，1996。
- 趙鼎，《辯誣筆錄》，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函海本。
- 潘閬，《逍遙集》，收入《知不足齋叢書》，清乾隆鮑廷博校刊本。

寧希元校點，〈地藏王證東窗事犯雜劇〉，收入《元刊雜劇三十種》，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1988。

羅大經撰，王瑞來點校，《鶴林玉露》，北京：中華書局，1983。

## 二、近人論著

### (一) 考古報告

大同市博物館，〈大同金代閻德源墓發掘簡報〉，《文物》，1978：4(北京，1978)，頁 1-13。

山西省古建築保護研究所、柴澤俊、張丑良編，《繁峙巖山寺》，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聞喜縣博物館、楊富斗，〈山西省聞喜縣金代磚雕、壁畫墓〉，《文物》，1986：12(北京，1986)，頁 36-4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汾西縣文物旅遊局，〈山西汾西郝家溝金代紀年壁畫墓發掘簡報〉，《文物》，2018：2(北京，2018)，頁 11-22。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陵川縣文物局，〈山西陵川玉泉金代壁畫墓發掘簡報〉，《文物》，2018：9(北京，2018)，頁 22-32。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晉東南工作站，〈山西長子縣石哲金代壁畫墓〉，《文物》，1985：6(北京，1985)，頁 45-54。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晉城博物館、高平市文物保護中心，〈山西高平湯王頭村金代墓葬〉，《華夏考古》，2020：6(鄭州，2020)，頁 37-44。

中國考古學會編，《中國考古學年鑒》2013，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市王家庄金元壁畫墓發掘簡報〉，《文物世界》，2016：3(太原，2016)，頁 3-5。

王俊、閻震，〈山西晉中發現金代正大五年墓〉，《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3：10(北京，2013)，頁 6-8。

王進先，〈山西壺關下好牢宋墓〉，《文物》，2002：5(北京，2002)，頁 42-55。

王進先、楊林中，〈山西屯留宋村金代壁畫墓〉，《文物》，2003：3(北京，2003)，頁 43-51。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元鐵可父子墓和張弘綱墓〉，《考古學報》，1986：1(北京，1986)，

- 頁 95-114。
- 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甘泉縣博物館，〈陝西甘泉柳河渠灣金代壁畫墓發掘簡報〉，《文物》，2016：11(北京，2016)，頁 40-50。
-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西安曲江元代張達夫及其夫人墓發掘簡報〉，《文物》，2013：8(北京，2013)，頁 27-48。
- 李方玉、龍寶章，〈金代虞寅墓室壁畫〉，《文物》，1982：1(北京，1982)，頁 52-53。
-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北井陘縣柿莊宋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62：2(北京，1962)，頁 31-73。
-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石家莊後太保村史氏家族墓發掘報告〉，《河北省考古文集》，第 1 輯，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頁 344-369。
- 長治市博物館，〈山西長子縣小關村金代紀年壁畫墓〉，《文物》，2008：10(北京，2008)，頁 60-69。
- 長治市博物館，〈山西長治市魏村金代紀年彩繪磚雕墓〉，《考古》，2009：1(北京，2009)，頁 59-64。
- 南雄縣博物館，〈廣東南雄宋代陶罈墓〉，《考古》，1984：7(北京，1984)，頁 601。
-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2009 年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調查發掘新收獲〉，《考古與文物》，2010：2(西安，2010)，頁 3-13。
-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藍田呂氏家族墓園》，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
- 商彤流，〈長治市安昌村出土的金代墓葬〉，《藝術史研究》，6(廣州，2004)，頁 407-420。
- 商彤流、郭海林，〈山西沁縣發現金代磚雕墓〉，《文物》，2000：6(北京，2000)，頁 60-73。
- 商彤流、楊林中、李永杰，〈長治市北郊安昌村出土金代墓葬〉，《文物世界》，2003：1(太原，2003)，頁 3-7。
- 聊城地區博物館、陳昆麟，〈山東高唐金代虞寅墓發掘簡報〉，《文物》，1982：1(北京，1982)，頁 49-51。
- 楊林中、王進先、暢紅霞、王偉、李永杰，〈山西壺關縣上好牢村宋金時期墓葬〉，《考古》，2012：4(北京，2012)，頁 48-55。
- 楊富斗，〈山西侯馬金墓發掘簡報〉，《考古》，1961：12(北京，1961)，頁 681-683。
- 煙臺市博物館，〈山東萊州南五里村宋代壁畫墓發掘簡報〉，《文物》，2016：2(北京，2016)，頁 4-20。

葉萬松、余扶危，〈新安縣石寺李村的兩座宋墓〉，收入《中國考古學年鑒》1985，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聞喜縣博物館，〈山西聞喜寺底金墓〉，《文物》，1988：7(北京，1988)，頁 67-73。

劉巖、程勇、安建峰、李斌、程虎偉、陳鑫、孫先土、張志偉、皇甫子鍼，〈山西高平湯王頭村金代墓葬〉，《華夏考古》，2020：6(鄭州，2020)，頁 37-44。

劉巖等，〈高平市湯王頭村金代墓葬〉，收入中國考古學會編，《中國考古學年鑒》2013，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頁 171-172。

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鄭州宋金壁畫墓》，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

濟南市博物館、王建浩，〈濟南市區發現金墓〉，《考古》，1979：6(北京，1979)，頁 507-509。

濟南市博物館、濟南市考古所，〈濟南市宋金磚雕壁畫墓〉，《文物》，2008：8(北京，2008)，頁 33-54。

謝虎軍，〈靖康元年(1126 年)宋四郎墓〉，收入謝虎軍、張劍編著，《洛陽紀年墓研究》，鄭州：大象出版社，2013，頁 646-648。

## (二) 中日文研究

《中國墓室壁畫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墓室壁畫全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11。

王曾瑜，〈宋衙前雜論(一、二)〉，《北京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6：3(北京，1986)，頁 76-82；1987：1(北京，1987)，頁 49-57。

王義印，〈山西屯留宋村金代壁畫墓墨書題記研究〉，《中原文物》，2014：6(鄭州：2014)，頁 113-118。

白彬，〈山西地區金元道士墓研究〉，收入黎志添編，《道教圖像、考古與儀式——宋代道教的演變與特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6，頁 123-163。

石守謙，《山鳴谷應——中國山水畫和觀眾的歷史》，臺北：石頭出版，2017。

任萬平，〈論金代文化區域結構〉，收入陳述主編，《遼金史論集》，第 5 輯，北京：文津出版社，1991，頁 237-254。

余城，〈北宋畫院制度與組織的探討〉，《故宮學術季刊》，1：1(臺北，1983)，頁 69-

96。

吳松弟，《北方移民與南宋社會變遷》，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

吳松弟著，葛劍雄主編，《中國人口史》，第3卷，遼宋金元時期，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

李天鳴，〈靖康之難——宋金第二次汴京之役〉，《故宮學術季刊》，24：4(臺北，2007)，頁 25-70。

李天鳴，〈靖康元年夏秋之太原之役〉，《故宮學術季刊》，22：1(臺北，2004)，頁 145-182。

李浩楠，〈山西屯留宋村金代壁畫墓題記考釋〉，《北方文物》，2010：3(哈爾濱，2010)，頁 76-78。

李慧淑，〈宋代畫風轉變之契機——徽宗美術教育成功之實例(上)、(下)〉，《故宮學術季刊》，1：4(臺北，1984)，頁 71-92；2：1(臺北，1984)，頁 9-36。

孟嗣徽，〈巖山寺佛傳壁畫圖像內容考釋——兼及金代宮廷畫家王逵的創作活動〉，《故宮學刊》，2(北京，2005)，頁 320-367。

延保全，〈侯馬二水 M4 三支金代墨書戲曲釋疑〉，《中華戲曲》，2003：2(臨汾，2003)，頁 6-21。

金文京，〈『孝行錄』と「二十四孝」再論〉，《藝文研究》，65(東京，1994)，頁 269-287。

金文京，〈略論《二十四孝》演變及其對東亞之影響〉，《中國文化研究》，2019：2(北京，2019)，頁 42-60。

宿白，《白沙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57。

康保成、孫秉君，〈陝西韓城宋墓壁畫考釋〉，《文藝研究》，2009：11(北京，2009)，頁 79-88。

張明華、李曉黎，《集句詩嬗變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曹星原，《同舟共濟——《清明上河圖》與北宋社會的衝突妥協》，臺北：石頭出版，2011。

陳昭揚，〈金代漢族士人的地域分布——以政治參與為中心的考察〉，《漢學研究》，26：1(臺北，2008)，頁 103-135。

陳瑞農、趙振華，〈鄭澤墓志與李公麟《擁馬醉歸圖》〉，《東南文化》，1991：1(南京，1991)，頁 97-99。

陶晉生，《宋代外交史》，新北：聯經出版，2020。

- 傅熹年，〈中國古代的建築畫〉，《文物》，1998：3(北京，1998)，頁 75-94。
- 喬新華，〈從武到文——宋元時期山西地域角色變化及其原因探討〉，《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1：2(太原，2008)，頁 132-136。
- 飯山知保，〈金代科舉制度變遷與地方士人〉，《科舉學論叢》，2010：1(上海，2010)，頁 12-27。
- 黃寬重，《南宋時代抗金的義軍》，臺北：聯經出版，1988。
- 黑田彰，《孝子伝の研究》，京都：思文閣出版，2001。
- 楊及耘、高青山，〈侯馬二水 M4 發現墨筆題寫的墓志和三篇諸宮調詞曲〉，《中華戲曲》，2003：2(臨汾，2003)，頁 1-5。
- 楊愛國，〈墓壁題詩——中國古代墓葬詩歌裝飾初探〉，《中國美術研究》，2016：1(上海，2016)，頁 4-10。
- 董新林，〈北宋金元墓葬壁飾所見「二十四孝」故事與高麗《孝行錄》〉，《華夏考古》，2009：2(鄭州，2009)，頁 141-152。
- 路方鵠，〈山西上好牢宋金墓壁題詩小考〉，《中華文史論叢》，2014：3(上海，2014)，頁 282。
- 寧希元，〈早期諸宮調歌詞的重大發現〉，《中華戲曲》，2004：2(臨汾，2004)，頁 12-24。
- 廖奔，〈磁州窯元白地黑花長方形瓷枕論考〉，《文藝研究》，2019：5(北京，2019)，頁 104-117。
- 廖奔，〈誤讀的諸宮調「重大發現」——侯馬二水金墓曲辭解〉，《戲曲研究》，2019：2(北京，2019)，頁 185-206。
- 廖咸惠，〈體驗「小道」——宋代士人生活中的術士與術數〉，《新史學》，20：4(臺北，2009)，頁 1-58。
- 裴普賢，《集句詩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5。
- 裴普賢，《集句詩研究續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9。
- 劉祥光，《宋代日常生活中的卜算與鬼怪》，臺北：政大出版社，2013。
- 劉靜貞，〈女無外事？——墓誌碑銘中所見之北宋士大夫社會秩序理念〉，《婦女與兩性學刊》，4(臺北，1993)，頁 21-46。
- 鄧菲，〈關於宋金墓葬中孝行圖的思考〉，《中原文物》，2009：4(鄭州，2009)，頁 75-81。
- 鄧菲，〈試析宋金時期磚雕壁畫墓的營建工藝——從洛陽關林廟宋墓談起〉，《考古

- 與文物》，2015：1(西安，2015)，頁 71-80、123。
- 鄧菲，《中原北方地區宋金墓葬藝術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9。
- 黎志添編，《道教圖像、考古與儀式：宋代道教的演變與特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6。
- 魏文斌等，〈甘肅宋金墓「二十四孝」圖與敦煌遺書《孝子傳》〉，《敦煌研究》，1998：3(蘭州，1998)，頁 75-90。
- 譚其驤，〈山西在國史上的地位〉，《晉陽學刊》，1981：2(太原，1981)，頁 2-8。

### (三) 英文研究

- Bickford, Maggie. "Emperor Huizong (1082-1135, r. 1100-1126) and the Aesthetic of Agency." *Archives of Asian Art* 53 (March 2002): 71-104.
- De Pee, Christian. *The Writing of Weddings in Middle-Period China: Text and Ritual Practice in the Eighth through Fourteenth Centuri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7.
- Deng, Fei. "Modular Design of Tombs in Song and Jin North China." In *Visual and Material Cultures in Middle Period China*, Edited by Patricia Ebrey and Susan Huang, 41-81. Leiden: Brill, 2017.
- Ebrey, Patricia and Susan Huang ed. *Visual and Material Cultures in Middle Period China*. Leiden: Brill, 2017.
- Hong, Jeehee and TJ Hinrichs. "Unwritten Life (and Death) of A 'Pharmacist' in Song China: Decoding Hancheng Tomb Murals." *Cahiers d'Extrême-Asie* 24 (2015): 231-278.
- Hong, Jeehee. *Theater of the Dead: A Social Turn in Chinese Funerary Art, 1000-140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6.
- Hsu, Ya-hwei. "Reshaping Chinese Material Culture: The Revival of Antiquity in the Era of Print," Ph.D. diss. Yale University, 2010.
- Kuhn, Dieter ed. *Burial in Song China*. Heidelberg: Edition Forum, 1994.
- Kuhn, Dieter. *A Place for the Dead: An Archaeological Documentary on Graves and Tombs of the Song Dynasty (960-1279)*. Heidelberg: Edition Forum, 1996.
- Ledderose, Lothar. *Ten Thousand Things: Module and Mass Production in Chinese Ar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 Sturman, Peter C. "Cranes Above Kaifeng: The Auspicious Image at the Court of Huizong." *Ars Orientalis* 20 (1990): 33-68.
- Wu, Hung. *The Double Screen: Medium and Representation in Chinese Paint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 Wu, K. T. "Illustrations in Sung Printing."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28:3 (July 1971): 173-195.
- Zhang, Cong Ellen. *Performing Filial Piety in Northern Song China: Family, State, and Native Plac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20.

### 三、網路資料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  
<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
- 北京大學數據分析研究中心，「《全唐詩》分析系統」，<http://www.chinabooktrading.com/tang/>.
- 北京大學數據分析研究中心，「《全宋詩》分析系統」，<http://www.chinabooktrading.com/song/>.

## **An Alternate Perspective on the Song-Jin Transition: Migration of Artists and Artisans and Post-War Shanxi as Seen through Underground Tombs**

Ya-hwei Hsu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e Song-Jin war caused a large population of northern China to migrate elsewhere. Scholar-officials documented the disastrous war in their writings; ordinary people, however, have almost no voice in historical accounts. How did they react to such political turmoil? With a focus on the elaborate brick tombs of the Northern Song and Jin excavated in Shanxi, this study discloses the circumstances that the local economic elite, to whom the tombs belonged, faced during the war. It also delineates the changes of Shanxi tombs from the Northern Song to the Jin, especially the use of calligraphy-like legible writings to decorate tombs. This indicates the elevated level of literacy of the artisans/artists involved in tomb construction, which might be due to the relocation of skilled artists/artisans from the former capital in Henan to Shanxi. Their migration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post-war prosperity there. Underground tombs offer an immediacy that allows researchers a glimpse into the world of the ordinary people unseen in received texts.

**Keywords:** mural writing in tombs, burial culture, popular poetry, immigrants of war, Chinese under Jurchen rule